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

(2014年4月1日)

卷首要论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

专题论坛

06

创意品牌 搭建平台 —— 加快推动达茂旗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中共达茂联合旗委员会 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

06

走进达茂

伏来旺

历史探幽

14

达尔罕、茂明安与召河的历史沿革

徐忠文 14

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初论

魏 坚 20

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镇探考

张文平 24

达尔罕和茂明安清末民初的放垦

斯仁诺日布 30

白云鄂博的发现与开发（摘录）

靳楷龄 34

内蒙古长城及其文化（三）

马 冀 38

文化视野

41

弘扬游牧文化 实现富民增收

王 军 41

“草原丝绸之路”的探源（摘要）

卢明辉 44

汪古部、敖伦苏木古城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李健民 48

红色记忆

50

百灵庙暴动与百灵庙抗战

马金中 50

赴百灵庙慰问抗战将士的爱国团体 刘建禄 54

草原英雄小姐妹 樊尚荣 56

文物古迹 60

达茂旗境内的旅蒙商及大盛魁遗迹 孟克德力格尔 60

沉默的历史——达茂旗境内的古长城遗址 班布日 62

长生天的祝福——达茂旗境内的著名敖包 刘茂云 64

石头的倾诉——达茂草原岩画巡礼 邓宏伟 66

人物春秋 72

神勇英雄哈布图哈撒儿 张 贵 72

阿刺海别吉与汪古部 孟克德力格尔 76

额仁庆达来起义 陈全增 84

舍己救人的武装部长——孟克达赖 黄海霞 86

诗苑撷英 87

纪念百灵庙武装抗日暴动50周年(外一首) 布 赫 87

重游百灵庙 肖 克 87

赴达茂有感 杨植霖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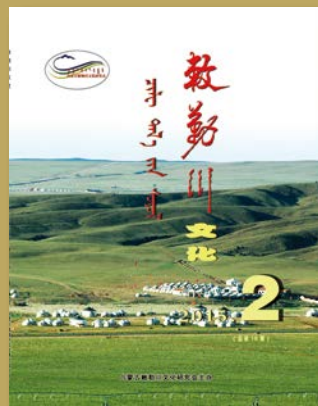
草原千里白云天 邓 拓 87

敖伦苏木古城 康丕耀 88

希拉穆仁草原 胡云晖 88

文墨瀚海 89

达茂旗部分书画家及作品介绍 89



主 办：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编辑出版：《敕勒川文化》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伏来旺
编委会副主任：王振义 董汉忠
马 冀 刘建禄
王德恭 邢 野
潘照东 韩瑞峰

主 编：刘建禄
副 主 编：艾 静
责任编辑：杜少俊 王 军

编 校：张 宇
发 行：吴俊清
美术装帧：魏 敏

地 址：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二道
内蒙古元和集团院内西二楼

邮 编：010010
邮 箱：clc4901612@163.com
电 话：0471—3245480
内新图准字(2010)第16号(19)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创意品牌 搭建平台

——加快推动达茂旗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中共达茂联合旗委员会 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

达茂联合旗是内蒙古自治区19个边境旗(市)和33个牧业旗之一。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其中天然草牧场1.6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万人，其中蒙古族1.73万人，其他少数民族1.83万人，是包头市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蒙满都拉一杭吉口岸是这一地区向北开放的重要通道之一。

达茂旗名胜古迹众多，人文景观独特。希拉穆仁草原是自治区最早开放的旅游景区。境内有敖伦苏木古城遗址、乌兰察布岩画、金玺壕遗址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哈布图哈撒儿祭奠堂以及汉长城、北魏长城、康熙营盘等历史遗迹。1936年2月，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抗日的第一枪；同年11月，国民

党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取得的“百灵庙大捷”，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全国抗战之先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上世纪50年代，达茂人民献出世代祭奠的圣山——白云鄂博，以无私的胸怀支援了包钢建设。上世纪60年代，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光荣事迹，从这里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本世纪初，为保护草原生态，达茂两万牧民积极拥护国家围封禁牧政策，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草原，掀起一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2011年以来，为顺应国家推动文化事业繁荣、产业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农牧人民群众的期盼，立足达茂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我们最终把着力点放在了第三产业，重点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一、健全规划，强化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力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重在规划、意在创新。我们坚持规划先行，强化了规划引导作用。

一是健全完善旗域规划。达茂的文化旅游产业，多年来一直处于无序、自发阶段，发展水平较低。究其“症结”，就在于总体规划缺失、发展方向不明。2012年以来，我们围绕建设“达茂大景区”，聘请国内知名设计院、资深学者，编制完成了《达茂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确定了“一城、双核、两带、六区”的旅游空间总布局；编制完成了《达茂旗旅游形象战略及营销规划》、《城市品牌总体规划》，促使达茂旅游提档升级、稳健走出旗门；编制完成了《达茂旗干线（旅游）公路两侧规划建设控制性管理暂行办法》和《达茂旗乡村（草原）旅游管理办法

（试行）》，特别是针对12个苏木乡镇的不同实际，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别制定各地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由全局到细节，基本上形成宏观指导体系。几年里，我们就是用这些科学规划，总体把脉全旗旅游产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达茂旗文化旅游发展的方向问题。

二是完善景区景点规划。达茂旗不缺少文化旅游“看点”，怎么让“看点”变成景点，需要在规划上下功夫。这3年，我们对照A级景区标准，加快完善切合实际、指导性强的景区景点发展规划，重点编制完成《马鬃山现代农业休闲度假区发展规划》、《青龙湾滨水休闲度假区发展规划》、《杨油房水库旅游度假区旅游发展规划》、《清水湾专项旅游度假区旅游发展规划》等4个农区乡镇旅游度假区的专项规划，使各地旅游发展既符合全旗总体发展要求，又满足自驾旅游需求。坚持从严、从实、从细，先后完成了《希拉穆



仁草原休闲旅游区总体规划》、《希拉穆仁核心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达茂旗吉木斯泰大旅游区策划暨概念性规划方案》、《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控制性规划》、《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文化产业园控制性规划》、《哈撒儿景区规划》等景区规划，高起点、高标准编制的景区规划，有效确保了全旗各个景区发展不盲目、有遵循。

三是制定旅游发展《意见》。达茂旗地域辽阔，有草原，有滩涂、有山丘，地貌丰富，风情独特，距呼市、包头均为160公里左右，距京津冀地区700公里左右，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达茂草原是以休闲、旅游度假为主的自驾旅游的优选之地。综合考虑，今年初，提出打造“自驾达茂”基地发展定位。打造“自驾达茂”基地，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没有系统性的规划为指导不行。基于此，我们制定了达茂旗《关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达茂旗旅游发展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因地制

宜、市场导向，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区域联动、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完善以道路、交通、游览、汽车、餐饮、住宿、购物、金融、紧急救助、信息、安全和组合式服务为主体内容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自驾达茂基地保障力；围绕旅游推进一产、二产、三产等12个方面的工作，着力发展以休闲、度假、深度体验为主的自驾、自助游，力争到2017年建成服务体系较为完善的“自驾达茂”基地。

二、筑牢基础，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力

文化旅游产业健康长远发展，关键在于发展基础是否牢固、扎实。我们牢固树立打造“达茂大景区”的理念，扎实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

一是加强景区景点建设。高标准的景区、景点是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必备条件。按照“一城、双核、两带、六区”的总体规划布局，着重加强重点景区基础设





施建设，有针对性地打造一批A级景区。在景区提档升级上下功夫，重点推进希拉穆仁镇4A级景区创建工作，投资5300万元，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步道等镇区基础设施，完成红格尔敖包扩建任务（包括新建露天演艺中心和功能服务区），建成华宇房车营地，有效提升了景区服务能力。在景区均衡发展上下功夫，切实转变唯希拉穆仁草原独大、全域旅游发展不足的局面，在城关镇百灵庙投资1.5亿元，建设了集文化、体育、旅游、商贸为一体的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目前，工程全部完工投入使用，不断吸引游客向达茂境内深入。同步启动吉木斯泰、哈撒儿、满都拉口岸边境旅游区和巴音杭盖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景区建设工程，达茂旗旅游逐步从点上发展向点面结合转变。结合自驾旅游追求休闲自由的特点，我们优先谋划精品线路，统筹旗域内文化旅游资源，确定了达茂草原自驾游环线，环跨农区、牧区、林区，全程共计230公里；启动自驾游营地建设，在全旗12个苏

木乡镇谋划建设23个自驾游营地，截至目前，已成功打造15个，有效增强了自驾旅游的保障力和吸引力。

二是提升城乡建设水平。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构建“达茂大景区”，城乡建设必须符合标准。城乡所有建筑，必须同时具备使用和观赏功能，确保游客进入达茂，便体会到景区吸引力。推进中心城镇百灵庙建设，把“奶油色”确定为城市主色调，在建设改造中注入蒙元文化元素，全面拉开新城区框架，稳步推进旧城区改造，新建乌力吉陶海、阿刺海别吉等公园，努力让城镇彰显魅力。严格规范建筑物体量、高度、色彩、造型，做到与自然景观和谐，景观型城镇正在建设中形成。实施建制镇提档升级工程，拆废、改旧、建新，先行启动了希拉穆仁、明安、乌克忽洞等6个建制镇建设，分3年全部覆盖其他各地，努力把镇区建成“小、美、特”的精品。全面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累计建成新村24个、整治旧村47个，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实施美化、绿化和文化



著名表演艺术家齐宝力高马头琴合奏

植入工程，强化旅游观赏和休闲度假功能，整体提升达茂文化品位。切实强化道路交通建设，实施境内一级公路改造升级工程，努力建成“横跨东西、贯通南北”的“大通道”；同步实施通乡、通村、通景点公路建设，建成88公里旅游公路，促使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向北延伸，增强交通服务旅游的功能，切实满足自驾游客需求。抓好沿路沿线景观建设，修建了从呼包进入达茂的两个旗门，建设交通节点处的景观小品，努力让游客感受“一路美景”。

三是强化环境综合整治。环境即形象，直接影响旅游业发展。我们将整个旗域作为一个大景区，结合全旗“创卫”工作，启动实施“清洁家园、清理田园、清静草原”工程，重点整治农村牧区、街道社区、景点景区、道路沿线环境卫生，最

大限度地给来达茂旅游的游客呈现一个干净整洁、绿色天然的草原圣地。实施重点区域绿化工程，不断提升自驾达茂的生态吸引力。牢固树立“生态至上”理念，实施全面禁牧，努力实现保护草原、草原增绿目标，筑牢达茂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根本。注重软环境打造，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达茂形象代言人的理念，倡导全旗各族群众通过践行文明，将达茂的良好形象展示出去，以达茂人特有的淳朴、善良、热情、好客，赢得各方来宾的信赖。以“热爱达茂·尽责圆梦”主题实践活动为抓手，扎实开展了“文化达茂·全民导游”活动，全面提升达茂城乡居民文明素质和旅游素养。

四是创意高端品牌产品。文化旅游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体现在产品上。基于此，依托地区实际和资源特点，引入旅游

业发展先进理念，借助国家级高端平台，创意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承办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以此吸引了更多自驾游客。2013年，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包头市政府的共同支持下，达茂旗举办了为期80天的首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2014年，又举办了为期90天的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游客接待人数达到152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6.8亿元。两届文化旅游节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实践效果之好，在自治区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承办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实现了促县域经济发展，促农牧民增收，促民族文化的传承，促生态保护建设，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达茂品牌提升等多赢目标，达茂知名度、美誉度和对外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的成功举办，推动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入融合，带动了一大批创业和就业典型，推出了一系列有机绿色农畜品牌，激发了全旗各族干部群众的热情，体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受益的原则。

三、拓展外延，扩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力

旅游如果没有融入文化，没有文化的传承发展，就会变得僵硬。我们非常重视文化与旅游融合，让旅游增加活力、更具内涵。

一是深挖文化内涵。达茂旗不缺文化资源，随处一个地方都可能有“故事”讲。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与旅游结

合起来，也是这几年我们努力的事情。借力影视镜头和文化作品，展现文化内涵，成功编排演出大型民族音·舞·诗《草原祭礼》，编辑出版《达茂历史文化丛书》，拍摄上映电影《百灵庙的枪声》、《草原英雄小姐妹》，制作纪录片《秘境寻踪》；组织了“大美达茂”民族风情摄影展，今年又与新华社合作，邀请国内顶级摄影家，组织“影观达茂”摄影展，促使尘封已久的达茂文化尽快浮出水面。借势国家政策，最大限度保护文化资源，目前全旗共有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5处，自治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达到5处、37处；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个、市级10个；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23人，其中自治区级1人、市级7人。先后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哈撒儿祭祀文化之乡”、“中国楚拉嘎好来宝文化之乡”、“中国蒙古族游牧文化研究基地”，取得“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永久举办地权”。敖伦苏木古城被列入“蒙古族源、元朝帝陵”国家保护项目。

二是扩大宣传效力。达茂旗虽然地处边疆，但留下来了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要想把这些文化资源变成旅游优势，让达茂旅游更具吸引力，宣传营销是必然途径。我们按照走出去、引进来的思路，不断拉开旅游宣传框架。积极邀请国内主流媒体走进达茂，进行不间断宣传报道，把“自驾达茂”的“声影”传播到全国，让旅游宣传迈上高端平台。截至目前，已经和新华社、人民网等30多家省级以上宣传媒体进行了合作。积极推动旅游迈出旗

门、迈向全国，把旅游宣传引向多元化，先后分别赴山西太原和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举办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推荐会两次，特别是针对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把新闻发布会开到北京，方便更多国家级媒体参与进来，切实增强宣传效果。

三是对接国际语汇。达茂历史上处于东西方文明、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达茂的文化旅游，不缺少国际元素，我们也从来就没有把达茂旅游局限在本地。实践中，积极探寻与国家高端平台和国际对接的语汇，提升达茂旅游的影响力。2012年，组织国内研究蒙元文化和景教文化的知名学者，召开了首届敖伦苏木古城研讨会，推动景教研究回归世界，掀起更多人前来探秘古城的热情。2013年，组织召开首届哈撒儿文化研讨会，把哈撒儿这个享誉世界的人物重新推到台前，吸引更多人前来膜拜。2014年，组织召开国际草原论坛，集聚国内外知名学者共同研究探讨，促使草原文化真正走出达茂。

四、聚合发展，丰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力

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与其他产业融合共生，构建发展大格局。我们推动三次产业向旅游业靠拢，最大限度聚合多元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力。

一是推动一产与文化旅游结合。我们坚持“为游而种、为游而养”的理念，积极打造农牧业旅游产品，努力实现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结合地区优势，探索发

展观光体验游，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沿农区公路，打造了几处观花旅游点，让自驾达茂的游客一步入达茂就有看点；谋划建设黄花滩生态农牧业旅游观光产业园，积极打造达茂旗首个集生态观光、体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园区，吸引更多游客来达茂。借助旅游这个平台，更多高端消费群体了解达茂、走进达茂，达茂的产品也走进高端消费群体和市场，逐渐形成双向认同、互相选择机制。推动农牧业品牌化路子，先后申报农畜产品商标36个，培育出“达茂草原羊”、“达茂马铃薯”、“文公乡情”等一批市场认可的农畜产品品牌，把达茂的“土产品”做成金蛋蛋。创新市场营销模式，坚持“化大为小”，将原有农畜产品大包装变为小包装，更加符合游客购物需求；坚持“变生为熟”，把农畜产品变成半成品、变为成品，让游客直接食用，产品价格实现翻倍提升，农牧业更加自发向旅游靠拢。

二是推进二产与文化旅游结合。我们以丰富旅游商品为目的，依托达茂旗特有农畜产品、民族工艺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旅游商品生产加工业，着力打造土特产品、工艺品和纪念品三大系列旅游商品。先后成功打造“蓝色牧野有限责任公司”、“毕力格泰乳业”、“天喜粗粮”、“达茂草原羊”、“万和面粉”等15家农畜产品、民族特色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专门针对旅游市场，发展达茂草原羊深加工，马奶酒、奶制品制作，红皮小麦、莜麦、荞麦等小杂粮加工产业，延伸了农畜产品产业链条，在极大满足旅游市



达茂旗草原旅游文化节

场需求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农畜产品价值，实现了农牧民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支持鼓励农牧民特别是禁牧牧民中的能人匠人，发展皮画、骨雕、银饰和民族服装制作，为自驾游客提供更多特色商品。

三是加快三产与文化旅游结合。我们将服务业的重心转向旅游、游客，努力围绕旅游做大第三产业。针对全旗餐饮、住宿等旅游接待资源相对集中且总体不足的问题，在旗驻地百灵庙镇，开工建设占地3.2万平米的德宁府酒店，同时，鼓励城镇居民在旅游旺季发展家庭旅馆，切实提升游客接待能力。结合我旗地域特色，深度挖掘包装达茂旗特有的餐饮文化，打造出了蒙餐系列、牛羊肉伴侣宴等特色宴席餐饮品牌，以特色优势吸引游客。因应旅游市场需要，结合达茂实际，引导和扶持农牧民发展标准化的农牧家乐，推动农牧

民“离土不离家、离牧不离草”，实现就地转产就业，增加农牧民经营性收入，很大限度满足自驾旅游需求。目前，全旗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牧家乐达到208户，占全旗旅游接待点总数的74%。

面对文化旅游业发展新形势，下一步，我们将顺应发展潮流，结合达茂实际，按照制定出台的《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一产围绕旅游调结构，二产围绕旅游打品牌，三产围绕旅游搞服务，交通围绕旅游上档次，城乡建设围绕旅游树形象，林业围绕旅游出景点，文化围绕旅游创特色，宣传围绕旅游造声势，政法围绕旅游保平安，教育围绕旅游搞培训，草原围绕旅游增绿色，各行各业围绕旅游聚合力，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力加快自驾达茂基地建设，实现达茂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走进达茂旗

伏来旺 吴俊清

夏秋之交，驱车从呼和浩特出发，翻过大青山，出五川县境，进入达尔罕茂安草原。继续向西，约一个多小时，来到达茂旗府所在地百灵庙。一路走来，一边观景，一边听达茂旗领导的旗情介绍，深深感受到这块神奇之地的魅力。

一、广袤的草原

达尔罕茂明安的草原辽阔、浩瀚，地形以丘陵为主，中、西有低山缓坡，北部台地间有开阔平原，总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境内有6条水系，9条河流，最长的艾不盖河，发源于新宝力格苏木，经百灵庙镇东流，注入腾格淖尔（湖），横跨达茂旗、固阳县、武川县，全长192公里，流域面积7185平方公里。现在的艾不盖河虽成为季节性河流，但仍是包钢的重要水源地。

辽阔的草原上，有一块希拉穆仁经典草场。“希拉穆仁”为蒙语，意为“黄河”。因河畔有一座清代喇嘛教寺庙“普会寺”，民间俗称“召河”。寺庙附近是阿勒宾敖包，河畔的牛、马、羊群似珍珠撒落，像彩霞飘荡。每当夏秋季节，四面八方的宾客会蜂涌而至，热情的牧民总会在蒙古包中高举银碗哈达，唱起祝酒歌，欢迎远方的客人。当夜幕降临之时，天空繁星点点，银河清澈，欢乐的人群围在篝火旁载歌载舞，尽情享受大草原的欢畅。

达茂草原的人文景观独特，名胜古迹众

多。有汉长城、魏长城、金堑壕等历史遗迹，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敖伦苏木古城遗址。近代，有许多革命英雄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

二、旗名的由来

达尔罕、茂明安是历史上两个蒙古族部落，明末清初相继迁到这块草原定居。成吉思汗在位时，曾把蒙古汗国的部分土地和属民分封于诸弟，其二弟哈布图·哈撒尔封地在今呼伦贝尔、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大部分地区及俄罗斯、蒙古国的部分地区。哈撒尔部族人丁兴旺，派生出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鲁科尔沁、茂明安、乌拉特、四子王部以及阿拉善、青海、新疆地区的和硕特部，蒙古国、俄罗斯境内，也有哈撒尔后裔分支。明末清初，哈撒尔第十六世孙车根，率茂明安部归附后金，并由尼布楚河流域西迁至今达茂旗境内的艾不盖河流域。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王朝封车根之子僧格为札萨克一等台吉，子孙世袭罔替，茂明安部改为茂明安旗。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世孙喀尔喀部落首领本塔尔率部归清，被封为札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到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本塔尔后裔改称达尔罕贝勒旗，迁驻今达茂旗境内。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达尔罕、茂明安两旗相继建立人民政权。1952年10月调整区划时，达尔



罕和茂明安两旗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现在的达茂旗隶属内蒙古包头市，是自治区19个边境旗（市）和23个牧业旗之一，全旗辖7镇、1苏木，12万人口，其中蒙古族2万人。旗府所在地百灵庙镇，在塞外草原上名声响亮。

三、悠久的历史

早在青铜器时期，达茂旗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属林胡、楼烦地。秦汉时隶属九原郡，为匈奴族游牧地。三国、两晋时，属北魏王朝怀朔镇管辖。隋唐时为东突厥属地，五代时达靼部占据。辽代隶属丰州及东胜州，金代属西京路净州，到元代属汪古部管辖。

汪古部系突厥后裔，原居新疆，约在唐朝末年迁到阴山一带，与当地鞑靼、党项等民族融合。原为金朝守卫金界壕，后归顺成吉思汗，被封为八十八功臣之一，论功授予五个千户，谕令子孙世代封王。其中，有4人封为北平王，3人封为高唐王，3人封为郾王，8人封为赵王。成吉思汗将自己的三女儿阿剌海别吉嫁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并与汪古部“世婚世友”。阿剌海别吉被称为“监国公主”，由此可以看出汪古部是大元帝国的属国，可谓“国中之国”。其权力掌控范围相当于今华北地区，这是达茂旗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当时的汪古部分设四路，分别是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砂井总管府，德宁路治所即今敖伦苏木古城。敖伦苏木，蒙古语意为“众多庙宇”，位于今达尔罕茂

明安联合旗政府北约三十公里艾不盖河北岸的草原上。敖伦苏木曾为汪古部的都城，也称“赵王城”，是汪古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固阳道、白道川翻越阴山，通向漠北的交通枢纽，称得上元代蒙古高原上一座名城。城中有一座教堂，是亚洲地区仅存的一座十三世纪建造的罗马教教堂，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研究价值。

朱元璋攻占北京后，敖伦苏木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第八代赵王汪古图投降了明朝。明廷为防止汪古图反叛，把汪古部臣民作为“散处降夷”分散安置，敖伦苏木古城随之废弃。明代中叶，达茂草原成为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领地。到清代，茂明安、达尔罕两个蒙古部落相继迁入，成为这块草原的主人。

四、浓郁的风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达茂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受到充分尊重，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族婚礼以及骑马、摔跤、射箭“三项技艺”既继承了传统，又融入时代风尚，特别是祭敖包与祭火习俗比较完整地保留。

关于敖包有多种传说：一说是历史上蒙古部落为纪念战争英烈而堆砌的土石包；二说敖包是蒙古族祭天求雨的祭坛；三说敖包是远行商人、马队、驼队的路标；四说敖包是打仗时传递信息的标志，作用等



同于烽火台；五说敖包是朋友相约和情人相会的老地方。由于敖包的“多功能”，使其在草原人民心目中地位逐步提升。佛教传入草原以后，祭祖活动和宗教活动结合，又增添了神秘色彩。牧人路过或远行，经过“敖包”都要下马往“敖包”上添加几块石头并虔诚参拜，祈祷人畜两旺、一路平安。

达茂旗的旗敖包原在白云鄂博。1953年，党中央决定新建包钢，白云鄂博作为原料基地，此地的牧民、牧场并敖包需要搬迁。考虑到蒙古族的信仰与习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自到达茂旗召开了牧民和僧侣代表座谈会，明确指示：新敖包选址要由蒙古族僧侣按照宗教传统来选择吉地，遇到困难由政府出面协调，搬迁方式要按蒙古族的风俗和教仪进行。之后，敖包搬迁到今达茂旗境内的巴音宝格达山顶，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在这里隆重举行敖包祭祀仪式和“蒙古三艺”比赛活动。这一天祭敖包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敖包前摆放全羊和各类供品，由深孚众望的长者主持，向敖包焚香、敬酒、献哈达、唱祭歌，喇嘛集体咏颂太平经。

接着旗长点燃酥油灯，旗委书记放归敖包圣马，乡镇苏木代表并“男儿三艺”的代表敬献羊背，所有来宾顺时针绕敖包三圈，祈求好运，保佑平安。然后观看精彩的“男儿三艺”比赛。

蒙古民族对火的敬仰与崇拜由来已久，儿子成家与父母分居时，要从父母家的灶火中引来火种，点燃新家的灶火，喻意祖先圣火永世不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百灵庙镇中心有一座祭火台，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举办祭火仪式，前来祭拜的各家户主向火中祭献各自的贡品，火苗愈来愈旺，冉冉升天。祭拜者齐声呼唤：呼瑞哎、呼瑞哎！意为“福禄吉祥降临吧！”

五、革命的传统

1936年2月21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千余名爱国官兵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时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策动下，由土默特籍蒙古族云继先、朱实夫等率领，毅然脱离日伪统治下的蒙政会，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内蒙古抗战的第一枪，开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先河。暴动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推迟了侵略者的西进日程，也表明了蒙古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意义极其深远。暴动队伍撤出百灵庙后，成立了蒙旗独立旅，转战到归绥南郊，与日军、伪蒙军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创。1938年5月，独立旅扩建为新3师，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缅怀先烈，于1989年10月在达茂旗府所在地建立了百灵庙抗战纪念碑。纪念碑园内设展厅，陈列参加武装暴动领导人及成员的照片和实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红色旅游基地”、“国家



达茂边防海关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抗日战争期间，达茂草原上还有一位女司令——额仁庆达来。丈夫被日寇暗杀，她组建起一支部队为丈夫报仇。1943年春天，绥远省政府委任她为达茂旗保安司令。额仁庆达来在绥远和后套一带与日寇进行了艰苦的武装斗争，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上个世纪60年代，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为保护集体羊群的光荣事迹，传遍祖国大江南北。这些革命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今天仍激励着达茂旗各族人民的斗志。

六、广阔的前景

达茂旗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是资源优势。这里地上有广袤的草原，肥活的农田，牛羊成群，亦农亦牧场；地下有矿藏32种，矿床、矿点130余处，煤、金、银、铜、铁、镍、铬、锰及各种建材矿储量可观；空间资源光能生产潜力巨大，风能资源是自治区风能资源Ⅰ级区中的核心部分和核心地带，达茂旗是内蒙古清洁能源基地之一。

二是地广人稀的优势。旗境地域面积大，人口相对少，人口密度6.2人/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资源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三是区位优势。地处呼、包、鄂经济三角区辐射圈内，旗府东南距呼和浩特市150公里，南距包头市147公里，北距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140公里。目前，口岸建设具备年过货500万吨的能力，成为自治区“向北开发”的重要通道。

四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优势。达茂旗自古就有民族相融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蒙汉等各民族更加团结，干群关系更加融洽，边境地区更加安宁，开创了一个

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达茂旗工业经济重点项目逐年增加，农牧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公共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政府多项工作成绩显著，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全国草原保护建设科技综合示范区”、“全区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旗”、“中国楚拉嘎好来宝文化之乡”、“中国蒙古族游牧文化研究基地”等等。

时下，旗委政府依据中央、自治区、包头市的发展战略，确立了“595”发展思路。即紧紧围绕“稳增长，提质量；转方式，调结构；抓城建，强基础；重商贸，惠民生；促和谐，保安宁”五项重点工作。明确“深化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乡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科教兴旗和人才强旗、保障和改善民生、特色文化建设、依法治旗和社会管理创新”等九大工程。努力实现“重点领域改革、口岸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文化旅游发展”五大突破。特别在文化建设方面，积极开展“德润草原文明之行”、“热爱达茂 尽责圆梦”主题实践活动，连续几年举办“中国游牧文化节”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达茂旗返回，我们感悟到，这个地处祖国北疆的边境旗民风淳朴，百姓憨厚，地灵人杰，自强不息；几套班子团结奋斗、步调一致，实事求是谋方略，开拓进取求发展。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符合实际，符合民愿，符合稳中求进、科学发展的新常态。我们坚信达茂旗前景广阔，达茂人的梦一定能够实现。

达尔罕、茂明安与召河 的历史沿革



达尔罕部落的由来

15世纪中叶，元太祖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图孟克继汗位（史称中兴烈祖达延汗）。16世纪初达延汗统一蒙古后，分封诸子，重建六个万户，其中将喀尔喀万户分封予阿尔楚博罗特和格埒森扎二子成两部。阿尔楚博罗特领内五鄂托克喀尔喀地区，形成漠南内五鄂托克喀尔喀集团。格埒森扎领外喀尔喀地区，将其所属领地全部分封给7个儿子，形成漠北外七鄂托克喀尔喀。后称“喀尔喀多伦和硕”（即喀尔喀七旗），分为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第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有子二，长子阿巴泰，号鄂齐赖赛音汗，为中路土谢图汗祖。阿巴泰次子额列克嗣位，号墨尔根汗。额列克有子二：长子衮布，始号土谢图汗，成为喀尔喀三个封建领主

之一。次子阿布琿，号墨尔根诺颜，有子三，长昂噶海，袭父墨尔根号；次子喇琿里，号达赖诺颜，生本塔尔、本巴什希、色尔济、札木素、额磷沁五子；三子图蒙肯，号昆都伦诺颜，其子策凌都伦生一子衮布，皆为喀尔喀中路台吉、隶属土谢图汗。

喇琿里的长子本塔尔和土谢图汗有隙，交恶到兵戎相见之势。于是本塔尔携其弟本巴什希、札木素、额磷沁和侄子衮布，率户千余于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南下附清。清廷赐驻牧塔尔浑河一带，置喀尔喀右翼旗。诏封本塔尔为札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统其部。康熙九年（1670年），喀尔喀右翼与四子王部落旗、茂明安旗、乌拉特东中西三旗会盟于四子王旗部落骨的乌兰察布地方，称乌兰察布盟。

喀尔喀左翼旗地在今库伦旗西部，其首领哀布伊勒登贝勒授封在本塔尔之后。1934年该旗并入库伦旗。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喀尔喀札萨克图汗沙喇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构衅，遣大臣莅盟于库伦伯勒齐尔，由归化城赍粮往，诏喀尔喀右翼札萨克所部选驼助运，康熙二十七年，诏选兵驻边侦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调所部赴图拉河，酌留兵之半驻归化城。康熙三十一年，所部灾情严重，清廷诏发杀虎口仓粟赈其部贫户。康熙三十五年五月，所部兵丁从大将军费扬古由西路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凯旋，诏留军营余米给其部众。十月，将大军瘦瘠弱马留其牧场饲牧。康熙三十六年，费扬古檄所部官兵于喀尔喀郡王善巴所辖界集会庆祝胜利。师旋从征兵丁都发了饷银。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诺乃亲王主持下开始修建塞北名刹“广福寺”(今百灵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王位传至诺乃亲王子詹达固密，由亲王降袭为札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降爵位的原因不详，也无记载，至此改称达尔罕贝勒旗。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因大雪伤牧产，诏发呼坦和朔储粟赈济所部灾民。

雍正九年(1731年)，本旗奉诏派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选精兵驻归化城。雍正十年，复随鄂尔多斯郡王扎木扬驻军乌拉特西界，雍正十三年始还。

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派遣大臣来本旗视察兵备和兵丁，颁发了赏银。

喀尔喀右翼旗自归附清廷后，旗部官



广福寺

兵卒不断应诏参战，为清朝统一祖国大业做出了贡献。

民国期间，沿用旧制，承袭清王朝对蒙古所采取的“恩威并施”方针，全盘保留了清朝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盟旗制度及其封建统治者享有的封爵厚赏等种种特权，并以怀柔羁縻的手段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全旗的统治权力仍掌握在封建专制特权者手中。民国三年(1914年)绥远与山西分治后，达尔罕贝勒旗隶绥远特别行政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绥远特别行政区改为绥远省，旗地属绥远省乌兰察布盟管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达尔罕贝勒旗百灵庙成立。国民党政府委任达尔罕贝勒旗札萨克亲王云端旺楚克为委员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百灵庙被日伪军侵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伪“乌兰察布盟公署”也随之在百灵庙成立，任命巴宝多尔济为盟长，沙拉布道尔吉为副

盟长，山本信为主任顾问。管辖地区除原有的六旗外又增加一个固阳县。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达尔罕贝勒旗属绥北行政区管辖。是时，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进驻本旗，并在百灵庙设立了办事处。

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和平解放，达尔罕贝勒旗仍属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辖之。1950年5月1日达尔罕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旗府设在查干库布。1952年10月，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合并，建立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简称达茂旗），旗府设在百灵庙镇。1996年5月，达茂旗由乌兰察布盟划归包头市管辖。

茂明安部落的由来

茂明安部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蒙古部落，是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撒儿的嫡系后裔。公元13世纪蒙古部崛起于漠北，首领铁木真先破塔塔儿，后征乃蛮等部统一了蒙古高原，把所有毡帐百姓统揽于属下。于1206年在斡难河畔聚集百万大众，召开由36个伊和乌鲁斯、72个巴嘎（小）爱玛克、3个伊和（大）爱玛克、9个库联参加的盛大的呼拉尔岱（大会）建立了“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国后，成吉思汗对其

母后、兄弟、驸马、文臣武将论功行赏，封爵位、赐牧地、分属民。封其胞弟哈布图哈撒儿为亲王，并将大小兴安岭以北额尔古纳、海拉尔海一带广袤肥沃的呼伦贝尔草原和4000户居民赐给哈撒儿统辖。这4000户逐渐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成阿鲁科尔沁、乌拉特、四子部、巴尔虎、茂明安等8个部落，统称阿鲁蒙古。

其中，哈布图哈撒儿十三世孙鄂尔图乃布延图之子锡喇奇塔特，号士谢图汗，有三子，长子多尔济，号布颜图汗，次子固穆巴图鲁，三子桑阿尔济洪果尔。多尔济过世后其子二，同为茂明安部首领，游牧于呼伦贝尔的沁查干朝鲁后达穆尼额尔德尼、查呼日台那林高勒一带（现在额尔古纳的尼布楚地区，1690年通过《中俄尼布楚条约》将此地划给沙俄）。

车根时期，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雄起于长白山一带，日趋强盛。继而统一其部众，建立了后金，1636年改女真族为满族，改国号称清。1627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位，改年号为天聪。适值蒙古诸部内征战争不断，皇太极采取婚姻、分化、武力征服等方式，征服其周围的诸蒙古部，为实现自己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宏图大业创造了契机。

天聪七年（1633年）茂明安部首领车





根偕其叔父固穆图鲁、台吉达尔玛岱滚、乌巴什等携千余户居民归附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茂明安部的台吉扎固海杜凌、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湖棱、都喇勒、巴特玛、额尔忻岱青、阿布等陆续归附后金。皇太极为前来归附的茂明安部举行了盛大的庆宴，并赏赐甲胄、雕鞍、银币。从此，骁勇善战的茂明部告别故土，边征战边迁徙，揭开为后金（清）开疆扩域、推翻明朝的征战历程，为整个部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生存与发展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将茂明安部由呼伦贝尔西迁至艾不盖河源一带，置茂明安旗，乌兰察布设立后属该盟。

乾隆十二年（1747年），茂明安旗札萨克一等台吉齐旺锡喇布因伙同其次子纳旺苏德纳木、台吉陶德日海等伪造印章而被革职。由其子根敦札木素奉谕继承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根敦札木素卒，其子萨木坦札木素奉诏继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札萨克一等台吉爵位的永久世袭制是从这里开始的。

道光二十年（1840年），茂明安旗与土默特发生争界冲突。理藩院遣派侍郎松筠前往勘探，是年八年复诏茂明安旗仍按乾隆年间原案、原图，将所设封堆、鄂博向该旗台吉逐一指明，并令双方从今以后按旧定界址各守其牧，不得相互侵越旗



界。这样，在较长时期内缓解了茂明安旗与毗邻旗之间的边境游牧冲突。

咸丰四年（1854年），绰克巴达尔琥执政时期，朝廷加两级，继承一级爵位。咸丰九年（1859年）朝廷恩赐绰克巴达尔琥一眼花翎。是年，茂明安旗多罗贝勒格楚克奉谕前往恰布其雅勒关（雁门）驻防。

同治七年（1868年），茂明安旗遭到东窜回军的骚扰，同治十年（1871年）绥远城将军定安遣侍卫成山统率吉林支队进驻茂明安旗，以防肃州回军再次犯境骚扰。此外，清廷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河南回军骚扰的监视和通报，在茂明安旗南界处的巴音洪格尔、毫赖、哈达图、乌兰霍硕专设卡伦，以之严防。

同治十一年（1872年），茂明安旗多罗贝勒格楚克奉诏前往萨德尔地区驻防。同年，札萨克绰克巴达尔孔因违误台站被议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茂明安旗多罗贝勒公布奉诏前往恰布其雅勒关（雁门关）驻防戍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帐房塔、水壕冲固阳县卜塔亥两处地段报垦。

清朝统一蒙古，结束了割据局面，为蒙古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朝

统治者比较注意牧民的休养生息，在对归顺的蒙古各部采取安排牧地、赐予牲畜、拨给钱粮等赈济措施的同时，又在一定的限度内采取“轻役减税”政策，限制蒙古王公对其属民过重的征敛。康熙三十年（1691年）曾旨令蒙旗各札萨克“嗣后具择好水草处游牧，轻役减税。务求永远营生之道”。雍正初年又告诫各旗札萨克王公等：若仍厚敛重徭，纳之于防危之域，使之于散亡，孰为尔等纳赋，孰为尔等供徭。清朝的“轻役减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牧民的负担，稳定了边塞。茂明安旗以“逐水草放牧为主”的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清末出现了“苏鲁克”（畜群）制，有诺颜仓苏鲁克、庙仓苏鲁克。

民国时期，茂明安旗仍属乌兰察布盟。新中国成立后，与达尔罕旗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召河的由来

召河位于达茂旗东南部的希拉穆仁镇，距旗驻地百灵庙镇、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分别为80、90和240公里。召河草原面积1000平方公里，希拉穆仁河横贯草



原，因河畔有座著名的清代喇嘛教召庙普会寺而俗称召河。

乾隆十六年（1757年），喀尔喀蒙古额附舍棱亲王之子仁钦道尔吉被确立为希力图召第六世转世活佛，法名阿嘎旺劳布森达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阿嘎旺劳布生达瓦南下赴京，觐见乾隆皇帝被恩准为席力图札萨克大喇嘛。

六世活佛从外蒙古来席力图召时，不仅带来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带来大量牲畜，据说当时就有马500多匹，牛几百头，骆驼十几峰和大小的羊群。负责放牧和管理这些畜群的20户居民从喀尔喀跟随活佛南下来到土默特。为了解决活佛的牲畜和属民的生活落后问题，当时清朝驻归化（今呼和浩特）的将军衙署在朝廷授意之下，把后山以北希拉穆仁河流域一带草场拨给了六世活佛。这块牧地的范围，北部、西北部与达尔罕贝勒旗、茂明安旗相接，东部与四子王旗相接，大约等于今天武川县全境加原来召河的面积，总面积大约3000平方公里。从此，活佛带来的属民便在这里居住生活下来。

为了感谢朝廷的恩惠，六世活佛用自己从外蒙古带来的钱财，在希拉穆仁河畔修



普会寺

建了一座佛教寺院。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竣工。乾隆皇帝赐名“普会寺”，并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为该寺题写了匾题。这座庙就是保存至今的召河大庙。

日伪统治时期，曾在召河地区设立席勒图旗，抗战胜利后撤销划入土默特旗。1954年，召河地区划入达茂联合旗。如今，召河草原已经成为达茂旗的著名夜生活景区。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政协原副主席



阴山 汪古与景教 遗存初论

魏 坚

一、汪古部的名称

汪古之名始于金末，在汉文史籍中有汪古、汪古惕、雍古、雍古多、瓮古、王孤等多种不同的译写。关于“汪古”一词的来源和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其一，北匈奴温禺牐王名字的借用。“北匈奴有温禺牐王其人，他的名字与汪古二字相同”。

其二，长城之意。“汪古部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并在是时，隶于契丹之阿勒壇汗（此处指金朝皇帝）。近类蒙古人，

古部名不论于长城，抑本于中国人名曰阴山之汪古山，然此民族之实在名称，未能知之也”。

据《新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谓：“汪古部乃白达达十五部之一。本为布而古特，亦曰贝尔忽特，辽人称为乌而古，屡降屡叛，后为金人所抚，属西北路招讨司。大定后，北族（即蒙古）渐强金堑山为界，以限南北，乌而古有帐四千，居界垣之冲要，屏蔽山后诸州。蒙古谓长城曰盎古，有讹为汪古”；又，汪古的名字源于瓮袞，“瓮袞蒙古语神也。”

长城之蒙古语译音，更非来自匈奴温禺犊王之名。

汪古部始称“白勒鞑”，最早见于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当时对汪古，常以汪古、白鞑混称。“汪古”一词在西方史料中出现较早的，有成书于1307年的拉施特丁《史集》和《马可·波罗行记》。从以上史料来看，“汪古”一词用于部族名，大概始于12世纪，普遍使用大约在13世纪之后。

二、汪古部的族源

汪古部的族源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外学者又有不同主张。综合各家之说，约归纳为四种观点：

其一，汪古属于突厥族。这里又可分为两种看法：一说属突厥诸族中的回纥（或回鹘）的一支，如说汪古是“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出于花门（指回纥）贵种”，“色目三十一一种之一”；一说属突厥诸族中的沙陀的一支，如谓汪古是“沙陀雁门节度之后”，“汪古部，亦沙陀突

鞑；一说汪古部本非蒙古族，而其后融合于蒙古族，如《新元史·氏族表》说：

“蒙古氏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者……皆为白塔塔儿。”

其三，汪古属于羌族。日人小野川秀美认为：“所谓汪古部，是金章宗时赋予守御静州以北新筑长城的唐古纥人的一种称呼”，“所谓白达达，也就是以羌族组成的河西鞑鞑的一个种落，迁到河套东北边的阴山鞑鞑的后身。他究竟是从党项或土蕃所派生，遽然难以肯定，但与羌族的唐古纥人系属同种”。

其四，汪古属于“若干小部族国家松散的联合体”。意为是由若干小部族综合而形成的名称，但彼此间仍留存有本部族的特点。

就史料分析和目前的考古调查来看，汪古部早在元代之前就已经迁居于阴山南北一带。这个部族的组成可以分为四大系统，即天德军丰州汪古、净州天山的马氏汪古、云中塞上的赵氏汪古和锡拉木伦河流的耶律氏汪古。

汪古部除以上的四大家族外，还有许



特平原的突厥人、回纥败亡漠南时被唐朝驱散后留在阴山一带的余部、唐末由雁北而来的沙陀人、金初释放的回纥俘虏等组成，可能还加入了其他民族成分。但是，不管族源如何复杂，汪古部人属于突厥语族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德宁路故城附近的景教墓地是汪古部王公贵族的墓葬，因此，汪古部的领地内是一个以汪古部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关于汪古部家族的史料，主要来自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刘敏中的《赵王先德加封碑》以及据此两碑写成的《元史·阿拉兀思剔吉忽里传》，还有后来发现的建于至正七年（1347年）的《王傅德风堂碑记》和建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的《大元冀宁路代州柏林寺重修唐节度使晋王李氏影堂碑》的记载。

1. 赵王城

赵王城，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约40公里处的艾不盖河北岸的冲击平原上，蒙古语称作敖伦苏木，为众多庙宇的意思。城南的艾不盖河，古称黑水，不知何时改名艾不盖河，有人认为可能是汪古部首领爱不花的谐音。从河道和河岸的断面看，河水已经大大北移，靠近城墙南垣。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用暗红色土分层夯筑。北墙长960米，西墙长580米，南墙长950米，东墙长560米。方向北偏西约40度。东墙残高约3米，其余3墙仅剩余断断续续的残壁，墙基宽近2米。在东、南、西三墙开设城门，并在外侧加筑瓮

城。城四角有角台。城垣在清代以前保存较好，后在清代修建百灵庙和达尔罕王府时，为获取建筑材料对古城破坏严重。城内院落遗址17处，建筑台基多达50余处。城内街道宽阔，布局整齐。在中部偏东南处有一大型院落，院内有一组建在高约3米的台基上的建筑遗址，著名的《王傅德风堂碑记》石碑即发现于此，其上残砖断瓦比比皆是，现在还残存有石柱础等，这组建筑物可能就是赵王府遗址。一般寺庙均修建于高大土台上。城内的元代建筑台基，曾经被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城内兴建藏传佛教寺塔时改造和利用，并在城东和城北兴建了一系列的覆钵式佛塔，现在塔身已经倒塌，在塔身和基座内埋有大量的“察察”（泥塑小佛像）。城内曾经发现过10块景教徒墓顶石，应当是明代在城内兴建佛寺时从城外汪古部的墓地运来充当建筑材料的。

从文献记载可知，这座古城在元代时，不仅有富丽堂皇的汪古首领的王府和王傅的府邸，还有许多建筑宏伟的基督教堂。如原来信仰景教，后受教主约翰孟德高维诺影响而皈依改宗天主教会的阔里吉思，就在城内修建过一座壮丽的罗马教堂。在城内东北角，采集到一些花纹贴面砖的残块，有的具有古罗马的建筑风格，还曾经发现过十字架的石刻，这应当就是罗马教堂的遗址。

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考古学者黄文弼在达茂联合旗考察了敖伦苏木古城。他在古城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汉文石碑和一通蒙文石碑，证实了此城址就是赵王城。1932年，美国

人拉铁摩尔也到此城考察，获得了景教墓顶石资料。这两次重要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后于1936年、1939年、1941年3次考察了这座古城，并在周围地区考察了汪古部旧城址和墓葬。上世纪70年代和本世纪初，内蒙古的考古学者及意大利学者也多次考察过这座古城。

2. 汪古部的景教墓地

汪古部是一个信仰景教的民族，景教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传到中国的名称。在唐代，各种宗教信仰都很活跃，聂思脱里派被称为景教，明代在西安附近的周至县发现了一通《大秦景教流行碑》，碑铭记载了景教在中国流传的经过。唐会昌五年间(845年)，唐武宗灭佛，其他各种宗教也都受到了打击，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为了避免遭受迫害，便跑到了北方草原地带，于是景教便在北方草原游牧民中扎下了根。金元之际，北方草原上的汪古部、乃蛮部和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

3. 汪古领地的社会生活

汪古部人生活的区域，地处阴山南北的农牧交错地带，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推断，其生业当是以定居的农业生产和家庭饲养业为主，同时商业贸易、建筑业和手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景教在中国的历史遗物

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镇探考

张文平

蒙元王朝实行投下分封制度。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国时，分封了95个千户。当时，汪古部受封的千户数，据《蒙古秘史》记载有5个千户，《史集》记载为4个千户。从为金朝戍守边墙的诸纥部族，到大蒙古国的贵胄，汪古部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汪古部随蒙古军四处征伐，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局限于原来的阴山以北一带，阴山以南的丰州、云内州、东胜州“西三州”地区也成为汪古部的管辖范围。

元朝在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以后，开始逐步限制汪古部的势力，将汪古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阴山以北一带，大体包括了今天的达茂旗、武川县、四子王旗、察右中旗、察右后旗和商都县的全境，以及察右前旗、兴和县的北部地区。汪古部或者利用金朝原有的边堡，或者新筑城郭，在自己的投下领地内，修筑了投下城

镇（投下意为封地，采邑，语出辽代）。

一、汪古部投下四路

（一）四路建制沿革

《元史·地理志》对汪古部投下四路，即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和砂井总管府仅列其名，而无地理沿革、户口等的记载。周清澍先生在《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一文中有一些具体、详尽的考证，可资借鉴。

汪古部部长世居于“黑水（今艾不盖河）之阳”之地，元世祖时在此一带建黑水新城。大德九年（1305），以黑水新城为静安路，领倚郭静安一县。延祐五年（1318）改静安路为德宁路，静安县为德宁县。至大二年，汪古部首领被世封为赵王，自此通称赵王城，为赵王世家之府

地，是汪古部领地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北元时期俺答汗曾在城内兴建了较大规模的庙宇，明末废弃。德宁路旧址即今达茂旗达尔汗苏木毛都坤兑嘎查西北约6公里处的敖伦苏木古城。

净州路最早在金代为一处榷场，金大定十八年（1178）置净州，领倚郭天山县，元代沿用，故址即今四子王旗吉生太镇城卜子村东的城卜子古城。古城西南有文庙建筑遗迹，原有“大元加封宣圣碑记”石刻一方，碑上刻“净州路总管府”、“大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立”等字，可知在大德十一年（1307）以前净州已升为路总管府。

集宁路在金代为集宁县，明昌三年（1192）以春市场置，故址即今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村北约1公里的土城子古城。城内出土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其上有集宁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和同知的题名，于皇庆元年（1312）正月刻石，可知于该年之前已升为集宁路，领倚郭集宁一县。

砂井总管府亦为路级建制，最晚在仁宗延祐三年（1316）以前已设总管府，领砂井一县，故址即今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希拉木仁庙村西南1公里的大庙古城。砂井最早见于记载，是1227年耶律楚材路过砂井所写的两首与友人唱和的诗中，称砂井或沙城。1232—1236年，宋人彭大雅、徐霆曾先后出使蒙古，回来在他们的旅行见闻《黑鞑事略》中写道：“出砂井，则四望平旷，荒芜际天”，又在砂井之下注明：“天山县（北）八十里。”大庙古城再往北即是金界壕，周清澍据此考证“砂

井在金末应是标志边界的城堡”。

蒙古南下攻金，首先突破的是金朝于大安二年（1210）在边境上修筑的乌沙堡。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五年（1210）庚午春，金谋来伐，筑乌沙堡。帝命遮别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六年“金复筑乌沙堡。秋七月，命遮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拔之。”而《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上记载：“天兵下中原，忠武为向导，南出界垣。”综合以上记载，结合蒙古灭金战争，可以看到，蒙古军于1210年在汪古部的导引下，越过界壕，攻破乌沙堡和乌月营，然后向东南方向进军，穿过野狐岭，在宣平之浍河堡大败金军，最后攻陷金中都。乌沙堡无疑是金军防御蒙古军的桥头堡，而且在汪古部所戍守的金界壕范围之内，这样与后来的砂井产生了一定的联系。砂井再往北便进入瀚海沙漠，砂井与乌沙堡可能均取其义，蒙古军占领乌沙堡后，改名为砂井，或径直称作沙城。中统初年，砂井是通往漠北的重要驿站和粮食“军储”所，后成为汪古部的主要投下城之一。至于乌月营，则应是乌沙堡南侧的金朝屯兵大营，并非城池。

（二）四路所在城址简述

1. 德宁路

对于敖伦苏木古城，以前的实测图主要有3个，测绘者分别为江上波夫、盖山林和邓宏伟等。200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使用GPS—RTK全球定位系统对该古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文物

城作了重新测绘（图一）。

古城东依黑山，南临艾不盖河，河流两岸为冲积平原。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正方向为北偏西45度，东墙长567米，西墙长560米，南墙长955米，北墙长980米。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基宽约3米，残高最高达2.5米左右。四墙各开一门，外加筑瓮城。城墙四角有角楼遗迹。

城址内街道布局整齐、宽阔，目前初步确定的街道有两横三纵。街道两侧可见大量的院落址和建筑台基。城址中部靠近南墙处有一处大院落，东西长287米，南北宽220米，南墙开门。院内西侧另有一处南北长130米、东西宽98米的小型院落，其内有一组高约3米的建筑基址，著名的“王傅德风堂碑记”石刻即发现于此。上述大院落即应为赵王府所在。城内东北隅的高台建筑，被多数学者认定为是罗马教堂遗址。此外，城内还有多处景教教堂遗址。有北元时期的喇嘛教寺庙建在元代的建筑遗迹之上。古城外东北部不远处，有若干土包连成一片，为一处关厢居民区。

古城内散布的遗物非常丰富，砖瓦、陶瓷片随处可见，以前发现的大件器物有

汉白玉双龙碑额、景教墓顶石、石棺板、花纹贴面砖和石狮子头等。

2. 净州路

郑隆早年对古城做过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1995年对古城做了勘测，并清理发掘了位于城南的部分墓葬。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使用GPS—RTK全球定位系统对该古城做了重新测绘（图二）。

古城位于一宽阔的山湾之内，地势平缓，东面紧邻塔布河，西、南两面为低矮的小山丘。分大、小两城，小城位于大城外西南部。大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正方向为北偏西27度，东墙长661米，西墙长700米，南墙长550米，北墙长525米。夯筑城墙，基宽8.5—9米，残高1—3米，门址不清。城内可见四横一纵共5条街道，分布高台建筑基址数处。西北部有两处并列的建筑基址，之间东西相距约15米，地表散布大量的砖、瓦和琉璃构件，以前还曾出土过佛像和彩塑等，出土推断应是和佛教寺院相关的建筑。“大元加封宣圣碑记”石刻出土于古城西南隅一座建筑基址之上，该建筑当为文庙所在。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文物

大城西南部有一凸出的小城，其北墙借用了大城的南墙，由北墙向南，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缓坡，从小城之内，可俯瞰大城全城。小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78米，南北宽130米。夯筑城墙，基宽约5米，残高2—3米，门址不清。南墙中部偏西处和西墙中部偏南处，各保存有一个马面，东南、西南两角均有角楼。城内分布在东南、西南和东北部的3处建筑基址保存相对较好，基址地表暴露有石砌墙基，周围散布大量的砖、瓦和琉璃构件等。古城内地表散布遗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瓷器和建筑材料等。瓷器中细瓷和粗瓷均占有一定的比例，釉色以白釉、白釉黑花和青蓝色釉钧瓷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黑釉剔花、龙泉窑青瓷和个别的青花、搅胎、红绿釉、黄釉和三彩等。釉面大多无装饰，少量的有印花图案，内底残存有支钉或圈足痕迹。器形有盆、碗、钵、盘、器盖和高足杯等。部分碗、格底存有墨书题记。

3. 集宁路

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为配合集张铁路建设，对古城遗址及城西墓

葬区进行了清理发掘；1976年，在古城内西北部清理一座丝织品窖藏，出土有“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字样的提花绦等重要文物；1977年，清理一座瓷器窖藏，出土龙泉窑双鱼洗等一批瓷器；1984年，乌兰察布市文物训练班对古城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探索了古城的城垣结构及城市布局，发掘出土了又一批瓷器；2002—2005年，为配合110国道集老（集宁—老爷庙）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古城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房址、道路、窖藏和灰坑等一系列重要遗迹，揭露出一处完整的市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各色瓷器，并对古城形制做了全面的勘探测绘。

古城北为平原，西面是一片宽阔的草滩，东、西两侧各有大小河流索回如带，均南流10多公里入黄旗海。东隔大河是一系列南北向的山丘。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40米，东西宽640米。地表现存东、北城墙，夯筑而成，基宽5—6米，残高2—3米，南城墙和西城墙均湮没于地下。东、西、北墙外筑马面，四角有角楼址，东、西墙各设一门，南墙上原来是否有门已不清楚。东门位于东城墙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门

位于西城墙中段，外置马蹄形瓮城。城内道路为六纵七横，城内北部正中有一大型建筑台基，“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石刻即出土于此。台基南部为市肆遗址。城外西侧有一条南北向道路与西门瓮城及城内道路相连。

2002—2005年的发掘在古城中心地带清理出来的市肆遗址，位于直达西城门的十字通衢两侧，属于城市的中心部位。市肆遗址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60米，由十字交股街道、房址组成。分布在十字街道两侧的临街房屋，多呈栅栏式布局，房前有石砌台面，室内部分以方砖铺砌地面，生活设施有火炕、石臼、石磨盘和大型陶瓮等。距街道较远的房屋一般开间较大，室内生活设施较少。据此推断，临街房屋当为居住、交易场所，距街道较远的房屋则是作坊和存放物品之地，形成了古城内一处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此外，还有饭馆、药店等遗迹。在东西向街道的一端，发现有栏杆基石，为用于开市、闭市的市门所在。

古城出土遗物丰富，以瓷器为大宗。这些瓷器多发现于窖藏之中，保存较好，窑系众多，涉及了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建窑等七大窑系。另出土大量的古钱币，总数达数万枚。

4. 砂井总管府

砂井总管府所在的大庙古城位于希拉木伦高勒（塔布河）东岸台地上。1975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郑隆、田广金等做过调

查。其后盖山林也做了调查。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使用GPS—RTK全球定位系统对该古城做了测绘（图三）。

古城平面大致呈方形，正方向为北偏西28度，东墙长559米，西墙长578米，南墙长553米，北墙长600米。夯筑城墙，基宽13米，残高0.5—2米。四墙中部各辟1门，外加筑瓮城。东墙北段残存5个马面，间距在50米左右；南墙残存3个马面。四角有角楼残迹。东墙外有护城壕，宽约18米。四门间通十字型街道，将整个城区分成大致相等的4部分，街道两侧均有土墙与城区相隔。城内残存一些大小不等、高低不一的建筑基址。地表散布遗物较少，有石磨、石臼和陶瓷片等，其中瓷片以白瓷、黑瓷和龙泉窑青瓷为多见。

二、汪古部其他投下城镇

在汪古部的领地范围内，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蒙元城镇还有武川县东土城古城、北土城古城、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四子王旗波罗板升古城、希拉哈达古城、察右中旗广益隆古城和察右后旗察汉不浪古城等。

三、结论

据蒙古文献的记载，汪古部内部分成31个农土，到成吉思汗时，又被分为4或5个千户，汪古部部长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及其侄镇国均为千户长，这些说明汪古部是由若干千户和农土构成的。在这些千户和农土之内，以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为首

的贵族们，在其领地范围内各自建立了自己的食邑城址，从而形成了大、小领主并存的局面。

在封王领主的投下城里，元成宗以后普遍设立王傅府，具体管理投下封地事务。未设立王傅府之前和未封王领主的投下城里，也有类似的机构。王傅府设王傅（正三品）、府尉（正四品）、司马（正五品）各三员，王傅由朝廷颁发银印、虎符，有自己的印信和衙门。王府的其他机构还有断事官、典食司、钱粮都总管府、人匠都总管府和怯怜口都总管府等。

为了加强对投下封地的管理，元朝中期以后，将一些投下城列入了国家统一的路、县等行政建制之中，汪古部四路即为这样的情况。如德宁路等，在城内设立路总管府，其官员有达鲁花赤、总管、同知等。但这些官员的任命，投下诸王有着极大的自主权。《经世大典》里记载道：

“古者诸侯分国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县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诸朝廷而后授职，不得通于他官，盖慎之也。”可见，从诸王王府、王傅府到路、县等属邑的官员，诸王都可以举荐自己的陪臣来担当，朝廷只是最后裁定、认可。这种诸王投下的陪臣担任官长的统治机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导致投下封地的地方行政与普通地方行政具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蜈蚣坝山谷中发现的“甸城道路碑”碑刻中，会出现在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下另又设置的“镇遏德宁天山分司”这样一级管理机

构，来加强对汪古部地区的管理。与投下领主分封制度相对应，投下城镇的城市布局，与充斥着平民坊市区的世俗化城市布局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城市的功能设置来看，主要是为投下领主所服务的，城内设施均与领主有关。一般居民居住在城外关厢地带，归人匠都总管府、怯怜口都总管府等管理，也是王府的属民。

另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丰州是汪古部的领地中心《马儿·牙八刺三世和列班骚马史》记载，东胜州是君不花和爱不花兄弟的驻营地。《鄂多立克东游录》也以为汪古部的首要城市是东胜。根据这些记载和当时汪古部的实际情形，一般认为阴山以南的丰州、东胜州以及云内州也有大量的汪古部属民。汪古部导引蒙古军南下攻金，大量的汪古人越过大青山到山南居住，甚至在陕北延安府一带都有了汪古人的踪迹，汪古部领主从而获得了这些地区的部分统治权。但汪古部对西三州的控制主要是在元代前期，自元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极力限制各投下领主的势力，汪古部在西三州的权力可能已经完全丧失了。从托克托县云中古城东北角城墙外出土的元代崔氏家谱碑上至元三十年（1293）“西三州织染局大使”的官职来看，西三州当时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地理概念，同时存在着统一管理的职能，中央政府对它们的管理应当是严密而有效的。

（作者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达尔罕和茂明安清末民初的放垦

斯仁诺日布

一、清末抗垦斗争

据史料记载，喀尔喀右翼达尔罕贝勒旗，自顺治年间投清，到光绪初叶近230年间，清朝统治者从分散蒙古民族力量的目的出发，在这里实行封禁政策限制农民，特别是汉人到蒙古地区开垦地亩，不准蒙汉人民之间交往联系，规定了各旗不得越界游牧和互相往来，不准出卖草场。全旗的肥沃草牧场均属贝勒。札萨克这些封建特权者世袭领地，广大属民只能过着以养畜为业、打猎为副、皮毛为宗、毡包为舍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同时背负着沉重的贡赋和劳役。乾隆五十年(1785年)，内地遭受旱灾，连年欠收，饥民日众。清政府才逐步放松了对内地汉人出口外的限制，允许灾民往蒙古地方谋食。于是，山西等邻近地区的农民渐渐被蒙古人所接收，移居到本旗南界边缘地带垦殖小块土地谋生，此后，达尔罕旗才有零零星居住的庄户人家，但这并不是官方正式准许放垦种地。同治初年，本旗以马希巴图台吉为首的个别特权者为了获取出租土地之利，不顾民众利益，在本旗南界地带擅自划出一片牧场，接收盲流农民开垦土地，独吞租银，遭到执政贝勒贡森台吉和蒙古族民众的强烈反对。马希巴图被判处

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再未出现私自开垦草牧场的事件。进入光绪末叶，随着清朝统治日趋腐败，战事频繁，民穷财尽，库藏日绌，军饷难筹。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经济的危机局面，延缓王朝专制统治的寿命，清统治者加速对塞外的经济掠夺和土地开垦，推行了以“移民实边”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政”，开放边禁，移民垦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委派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开始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官办垦务活动。此事激起了各蒙旗王公和民众的极端愤怒，大规模开垦土地的计划一时遭到了坚决抵制。当年九月，清政府以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盟长阻挠垦务为由，命理藩院严饬二盟盟长遵令放垦。此后，在贻谷的多次劝导和理藩院威逼利诱及武装镇压下，到了光绪二十九年，西部各蒙旗已逐步放垦。但是，以乌兰察布盟盟长、四子王旗札萨克多罗达尔罕卓哩克图郡王勒旺诺日布、副盟长、喀尔喀右翼旗多罗达尔罕贝勒云端旺楚克为首的六旗王公札萨克固执己见，抗旨不遵。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未报寸地，多次受到理藩院的严饬和威吓。

在《钦差垦务大臣》金宗第135卷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钦命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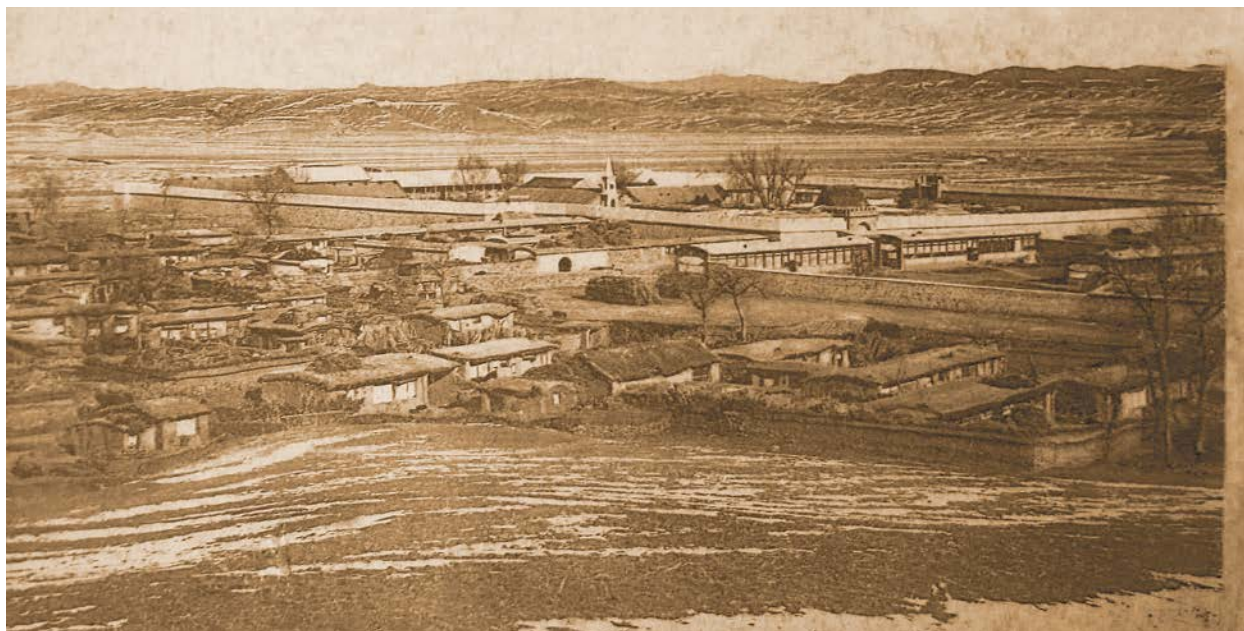
办蒙古事宜御前大臣管理理藩院事务和硕肃亲王善耆，根据皇帝旨意，严飭乌盟盟长迅速报垦，否则严惩不贷……据称伊克昭全盟已认垦，惟乌兰察布一盟，屡经钦催，而百计迁延，迄今尚未就议等语，似此疲顽狡展，殊属不成事体。由本爵大臣再行严切札催，该盟盟长四子郡王勒旺诺日布等赴绥就议，听候核办。并派二品道员来绥，协理贻谷办理乌盟垦务，将办理情形，随时上报。”四月，肃亲王又严飭乌盟盟长迅速报垦……“惟乌一盟，外示恭顺，内藏奸巧，降旨三四年之久，终大部文催，而该盟长勒旺诺日布百计迁延，迄今尚未遵飭就议。将军贻谷本应将阻挠抗违情形据实奏献，以示惩儆，惟念国家体恤蒙藩二百余年，且该盟长素性愚鲁、误信旁言，每每为其保全，不忍过事催逼，容忍至今……札仰该盟长四子郡王于文到之日，率同乌拉特三公速即前赴绥远

城将军垦务大臣行辕会商，以重朝命，遵守屏藩。勿得任意延玩，勿怀犹疑，自取咎戾。并将前往日期及会商就议情形，就近报知该将军，转行见复本爵大臣再行查本。”从上述记载可见，达尔罕贝勒旗的报垦事宜经历了四五年之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1906年8月14日)，在肃亲王的严飭逼迫之下，才勉强呈报开垦地界，办理了垦务事宜。

现将《钦差大臣垦务》第二百一十卷记述“达尔罕贝勒旗报垦经过和丈放、征收概况”摘录如下：

(1) 报垦及勘收经过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乌盟六旗札萨克台吉等联衔报垦，达尔罕旗札萨克贝勒云端旺楚克报垦该旗卓克苏拉塔地方宽长各15余里。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清末内蒙古地区村落

垦务大臣贻谷，札委即补协领钟祥、分省试用府经历胡奇为勘收达尔罕旗报垦地委员，令该二员同达尔罕旗蒙员前往地所详加勘验。八月十四日，钟祥、胡奇呈报勘验达尔罕旗报垦地卓克苏拉塔地方经过：

“委员等于七月二十二日速起程，二十四日行抵该旗报垦处所，辗转周勘东边卓克苏拉塔之地半熟半荒，大概沙石相向，地瘠民贫，恐将来招放不易，碍难接收。逐至该旗印上谒见贝勒，面请必指给易于放垦地亩。贝勒人甚明白，当时允诺，即派该旗东西图斯拉格齐官员于八月三日议定：该旗将从前租出之两约地亩相交，在西边卓克苏拉塔一带。钟祥、胡奇会同该旗派出之克加鲁格齐鄂其尔巴图、色勒德尔、梅林鄂斯巴达尔呼、鄂其尔扎布驰赴地所，传询商人云。初租此地二十年为限，限期早满，变为年租放种，各随其意。按原租图履勘，得该地一为公义成，地质尚佳；一为六合荣，地次之，熟在七成，荒在三成，土脉较好，村落稠密。会同蒙员堆立四至鄂博以定疆界：东至奎素，西至合拉合少，南至乌兰桃力盖，北至边墙，以十五里宽长计之，实属有赢无绌，接收清楚，已取具该旗蒙员等交地押结。八月十七日贻谷札批：……一为公义成，一为六合荣，既经勘明，地质尚佳，问清大界，取具该蒙员等交地押结及商人原图地图等件，办理尚周妥，仰候仍飭该旗另具交地印文，以凭奏报，并候分别咨札查照。八月八日，达尔罕旗加克鲁格齐章京鄂其尔巴图、委加克鲁格齐章京色勒达尔，正梅林章京鄂其尔扎布、委梅林章京鄂其尔巴达尔呼会同出具甘结，呈报六



清末内蒙古地区牧民

合荣、公义成二处租种地，宽长十五里之数，八面设立鄂博堆记，国朝应用之外，情愿具结呈报。

（2）丈放情况

光绪三十三年，乌盟垦务总局派委员即补协领钟祥，分省试用府经历胡奇到公义成、六合荣两地丈放，当年放竣。

（3）征收情况

达尔罕旗共放地九百九十七顷七十九亩六分，其中上地三百五十六顷七十七亩四分，每亩押荒银三钱，计应征押荒银一万零七百零三两二钱二分；下地六百四十一顷二亩二分，应征押荒银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两四钱四分，共应征押荒

银二万三千五百二十三两六钱六分，提三成经费，余数官蒙对分。到三十四年四月，已征押荒银八千四百七十八两九分，未征押荒银一万五千零四十五两五钱七分。

二、民国大放开垦

清末大力推行的所谓“移民实边”的政策，从长远的历史影响看，这一政策对边远的蒙古地区的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不顾蒙古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反对，强行开垦蒙旗土地，搜刮巨额押荒银，这种做法引起了农牧民纠纷，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当时的社会秩序愈加混乱。统治阶级充实边防的幻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使危机四伏，蒙众自发的抗垦斗争此起彼伏，纷争不断。当时正是“辟地千里，垦务大兴”之时，清政府为了平息蒙众愤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以“败坏边局、欺蒙巧取，蒙民怨恨”为由，将贻谷及其主要官员撤职查办。之后，整个蒙地垦务“已成弩末”，再没有出现大的进展。清王朝的许多“则例”“钦定”等巧取豪夺手段都留给了他的继承者。

到了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对蒙古的统治仍循清朝故辙，以怀柔羁縻手段，在政治上笼络王公上层，维护封建特权制，在经济上以开垦蒙荒为中心，进行搜刮掠夺，相继颁布了《垦辟蒙荒奖励办法》《边荒条例》等法规。开垦蒙地的名目之多，加捐之繁，手段之劣，大大超过了清末统治时期。

《边荒条例》规定，放垦蒙旗游牧地

段，由各蒙旗札萨克呈请上级核准开办，所收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该旗。本旗封建特权者为了获取地租之利，非但不采取保护牧场的积极措施，反而与地商相勾结，签发“地契”，大量出租土地。其地块之多，四至不明，亩数不清。大量超限开垦土地，本旗南半部草场成了王公贵族、庙仓和豪家的自耕地。“垦地日广，牧场益狭，民生日蹙”，导致这一悲惨结局的过程是多么迅速啊！

在民国末年，由于农地人口逐渐增多，人们用每年向外扩展几犁的办法扩大自耕地，致使原居牧户失去草场，只得往北迁居。为了限制这种无止境的“蚕食”，旗政府采取了农区沿界再放一部分土地给各苏木，准许每户牧民耕种三顷地，并把土地使用权固定给牧户自种自管，用这种方法抵挡民地的无限制地扩展。当时，分到土地的牧户，由于不善于耕作，大都把土地租给邻近的农户耕种，第一年按一九比例分享谷物，从第二年开始，根据年景和收成情况，双方协定按二八或三七的比例（土地使用者二或三，承包耕种者八或七）分成，由承包耕地者拉运、脱粒。此种耕作方法，自然是民间建立在互利互惠、相互依赖、自愿结合的基础上和睦相处的“伙计”关系。承租土地者不向旗府纳粮，遇有灾情，免于租粮，这就是当时所谓“辅助牧民”的分收地。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政协原主席）



白云鄂博的发现与开发 (摘录)

靳楷龄

一、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及丁道衡考察途中发现白云鄂博铁矿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起因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第四次组团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一生致力于科学探险。1894—1909年，他曾先后3次组团到我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探险考察。1926年末，61岁的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准备组团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到新疆

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开辟航线，并与北洋政府农商部订立了“契约”。西北科学考察团由27人组成。其中中方10人，瑞方17人。1927年5月9日12时40分，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火车启程西行。5月10日到达包头车站（今包头东站）。考察团在包头共住了9天。5月16日，考察团将40多吨各类器物全部搬至大货栈内待装。5月18日，赫定花1650圆钱租赁的220峰骆驼从放养地到达包头。至此，考察团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5月20日8时15分，考察团从包头城内启程西行，向着百灵庙方向进发，正式踏上了考察之路。行进中的考察团人员，包括团员、采集员、厨师和杂役人员共50多人。拥有骆驼232峰。驻包军队司令部派出30名骑兵作为卫队与考察团同时上路。

“中国人、瑞典人和德国人骑着骆驼排成纵队。他们身上背着长枪、望远镜和照相机。”（引自斯文·赫定《长征记》）。考察团的骆驼队浩浩荡荡，连绵数里，十分壮观。出城后的考察团，行经井儿坪梁、二道沙河、大仙庙、毛鬼神窑子、公忽洞，于5月20日下午两点到达昆都仑口子（即前口子）宿营，这是考察团行进中的第一个宿营地。5月28日到达阿木塞尔河脑包。这已经是考察团的第八个宿营地了。阿木塞尔河脑包东距百灵庙80里。因有小山环抱，水草丰美，考察团决定在这里长时间住下来，等候还没有购齐的骆驼，又可以把已买到的骆驼在肥美的牧场上喂得肥壮一些，以便日后长途跋涉。28日清晨，哈士伦和李伯冷带着他们从张家口北哈龙乌苏那里买来的65峰骆驼赶过来了。下午4时，那林、华志、马学尔的骆驼队也赶到了。虽然60峰骆驼只剩下51峰，“但仍不失为很威风的一队”（引处同上）。至此，考察团的全体团员和一些勤杂人员等均已全部到齐，实现了从哈龙乌苏、归化（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三地会集在百灵庙附近的计划。此时考察团人员共计62人。其中，中方团员10人，瑞方团员18人，采集员、厨师、夫役等34人。

7月1日，丁道衡所在的北队，率先

从阿木塞尔河脑包出发向西行进。7月2日，丁道衡在行进途中，望见北部远处有一座东西蜿蜒、颇为壮观的山岭，遂决意到那里探明究竟。傍晚，北队宿营于白云布拉克。他很快从蒙古族牧民那里得知，此山名为“白云鄂博”，亦称“白云博格都”，蒙古语意为“富神之山”。回到营地后，他便在马灯下查阅资料。从一张参谋部的军用地图上发现这一位置的标名为“哈喇托落海”（蒙古语意为“黑山头”），便判定哈喇托落海就是被称作白云鄂博的这座黝黑而神秘的山峰。7月3日拂晓，丁道衡便背着地质行囊，急切地奔向30里外的白云鄂博。他在自述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经过时曾写道：“三日晨，负囊趋往，甫至山麓，即见有铁矿矿砂沿沟处散布，愈近矿砂愈富。仰视山巅，巍然屹立，露出处，黑斑灿然，知为矿床所在。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则南坡半壁皆为矿区。”丁道衡后来在描写他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兴奋心情时说：“我访问了白云鄂博”，“很荣幸，我发现了它的秘密。”7月4日，丁道衡立即将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之事信告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据徐炳昶所著《西游日记》载：“五日接丁仲良信，报告发现白云博格都山为巨大铁矿。据说矿质虽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论，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然此地将来要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富源。”另在斯文·赫定所著《长征记》中，也记有丁道衡报告的有关情节：“5日，接到丁道衡的来信，报告在白云鄂博

（富神山）发现巨大铁矿。信中说，矿质虽未分析，全山皆为铁矿所成，……又经岩浆冲出，其他杂质皆气化而去，故其质地极纯。以衡推测，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全量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

根据丁道衡的初步发现，考察团总队特派专攻地图学的中方团员詹蕃勋到白云鄂博绘制了一份二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丁道衡又据此图对白云鄂博（主矿体）的地质状况进行了考查，并从矿体和围岩中采集了岩矿标本，以备日后室内研究之用。由于北分队活动要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丁道衡只得于7月中旬结束了对白云鄂博铁矿的初步考察，继续随队西进，并于8月6日在额济纳河一带与总队会合。丁道衡此次随团考察西北，历时3年，行程万里。除了考察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还完成了对天山南麓的地质调查。绘制地图百余幅，记录了大量资料，收集的地质标本及资料达35箱，另有风俗物什3箱。西北考察团的3年科考活动，成果甚丰。如袁复礼在新疆发掘的大量二、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瑞典团员贝格满和中国采集员靳士贵额济纳河流域发掘的10000多枚居延汉简等，都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发现。而丁道衡对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的发现，则是西北科学考察团自包头出发后所获得的第一个振奋人心并载入史册的重大成果。

二、丁道衡考察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后续影响

此题按时间顺序来讲，至少有两宗是

必须提及的大事：一是他的考察发现直接导致了何作霖先生最早发现了白云鄂博共生矿中的稀土矿物；二是他的考察发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决定兴建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物质前提。

关于何作霖先生在1934年最早发现白云鄂博共生矿中的两种储量最多的稀土矿物——氟碳铈矿和独居石的过程，我在《草原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功结合》一文中，曾做了简要介绍。本文所强调的是，何先生的室内研究乃是接手他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学丁道衡的请托，用丁道衡于1927年在白云鄂博考察时采回的岩矿标本完成的。没有丁先生的考察发现也就没有何先生的研究发现，这里面存在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包头素有“稀土之乡”之美称。“据1989年美国矿务局出版的《矿产品概览》，世界稀土工业储量为4500万吨，其中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为3600万吨，占世界储量的80%，居世界第一位。而其中白云鄂博的稀土储量又占国内的80%以上”，“（因此）业界便有‘世界稀土在中国，中国稀土在包头’之说”。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把何作霖先生与白云鄂博稀土矿相联系，而只把丁道衡先生与白云鄂博铁矿相联系。今天在纪念丁道衡先生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之际，笔者特提出以下观点：即丁先生当年考察发现的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就其实质来讲，乃是以铁稀土铌为主，富含71种元素的多金属共生矿。到今天为止，所有白云鄂博稀土矿物的研究发现和综合利用，都应当看成是丁道衡先生考察发现的后续影响。

关于丁道衡先生的考察发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决定兴建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物质前提，这本来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但其中的一些细节，还是有必要加以梳理，以便让后人对丁先生考察发现的后续影响有更为清晰的了解。比如说，在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月时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钢铁会议上，就确定了对白云鄂博矿产资源进行调查，并且在《会议总结》中明确地把包头列为“关内新建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党和国家就把开发白云鄂博和在包头建设“钢铁中心”提上议事日程？这还要从丁道衡先生考察发现的后续影响说起。丁道衡先生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发表于1933年12月。这份报告的发表，最先向外界宣告了在包头附近有一座极富开采价值的大铁矿，从而引起了地质学界和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而后的事实证明，这份报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高平对这一发现倍加关注，并于1947年亲自率人到白云鄂博铁矿进行踏勘，从现场采回标本后进行过室内研究。据原241勘探队队长严坤元的回忆，在1949年末，留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高平曾积极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处建议对白云鄂博进行地质工作，说“他亲自去踏勘过，认为远景大，地位好，可大举勘探，是一个最有远景的钢铁资源基地。”笔者以为，这一细节应该就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决定立即调查白云鄂博资源并把包头定为新建钢铁中心目标的最直接的原因。建议是高平提出的，分工调查白云鄂

博资源的任务又定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所以组织勘探队伍、调集设备等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当时华北各地只有7台能用的钻机，全部调给了白云鄂博调查队（后改称241勘探队）。经过4个月的紧张筹备，到1950年5月，调查队就到达了白云鄂博矿区。这时包头市人民政府才刚刚成立。经略查、详查证实白云鄂博确是一个储量丰富、品质优良和极有工业发展前景的巨大的多金属共生矿。据此，党和国家于1952年决定建设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如果说丁道衡先生考察发现的后续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那么“草原上建起钢铁城”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肯定是其中最重大的事件了。

从1927年7月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到1957年7月包钢在昆都仑河西岸举行厂区工程开工典礼，整整30年，丁道衡先生生前“苟能在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而钢城人民也会永远怀念这位以科学和诚心为包头带来福音的最可尊敬的前贤。1987年白云鄂博铁矿为了纪念该矿发现60周年，在矿区中心广场树立了丁道衡塑像。

（本文作者系包钢厂史办原主任，
包头市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

内蒙古 长城 及其文化（三）

马 冀

三、魏长城

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其国土中心地带在今河南、陕西境内。自魏文侯（公元前446—396年在位）时，重用李悝、西门豹等人推行变法，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国家逐渐强盛，成为战国初期强大的国家。但是其时西邻秦国和南邻楚国也日益强大，特别是秦国，经常与魏国发生战争，争夺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自秦筑堑洛长城之后，魏国不得不筑城防守。同时，魏的西北部国土又与西戎相接，防备西戎也是大事，于是魏国开始

大规模地修筑长城。魏国的长城有两道：一道是防秦、防戎的河西长城；一道是防楚、赵、齐等国的河南长城。关于魏长城，历来是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此处比勘诸家之说，益以考古学者的实测资料，简述如下，不拟参与论争。

魏河西长城又称“滨洛长城”，大约修建于公元前361—351年之间，延续10年之久。《史记·秦本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有上郡”即谓魏长城修至上郡。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曾解释秦、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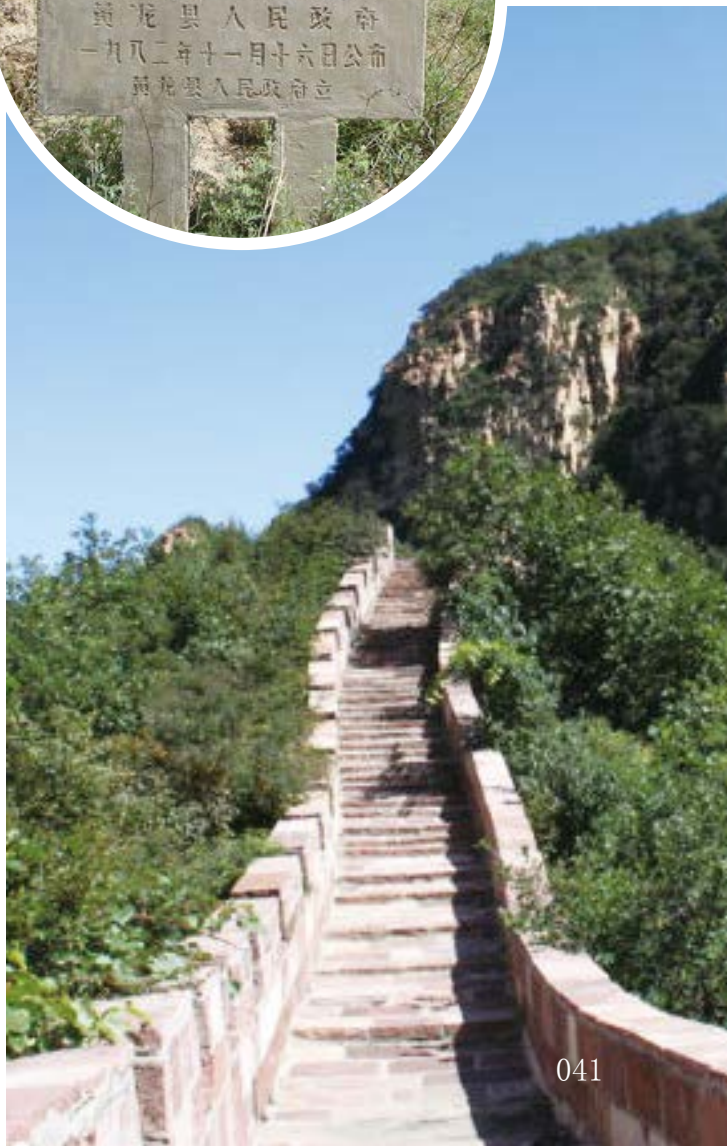
上郡的管辖范围：“《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酈、延、绥等州，北至固阳，并上郡地。”可见当时上郡范围，包括今陕北延安、绥德直到内蒙古伊克昭盟、包头市一带。《竹书纪年》又记：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8年，魏惠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更明确记载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筑长城，塞固阳”。卷十五《六国年表》也有相同的记载。《史记·正义》还注释说：“《括地志》云：‘固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可见，固阳即在今内蒙古大青山南麓、黄河以西的包头市境内。另《史记·匈奴列传》载：“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可见这道长城除防秦之外，还有防西戎的作用。

这道长城的起点在陕西华阴县华山脚下，经县城西北古城村，跨过渭河，沿滨洛河东岸北上，经大荔县城北，入澄城县境，再北至合阴县，过韩城县，沿黄河西岸北行。对这段长城，因有遗迹可循，争论尚不很大。但再往北，对其走向和终点，研究者便分歧百出了。张维华认为经韩城、延安、绥德等地止于佳县黄河岸边。^[1]他认为当时魏国的疆土不可能达到今内蒙古境界，故魏所修长城只能止于陕西境内。然而大多数学者根据《史记》等史籍的记载，认为魏长城从韩城循黄河西岸再向北经洛州、酈县、绥德、米脂等

地，进入内蒙古准格尔旗的黄河西岸，过十二连城，经达拉特旗，终点在包头境内的固阳塞。^[2]

根据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在今包头市东南黄河对岸达拉特旗白泥井乡、准格尔旗黑岱沟乡等



地均发现有长城遗迹。白泥井乡的长城起于李三壕村，跨过新民堡、王爱召、树林召、粉土圪旦，全长约100公里。新民堡的长城因土质缘故，呈白色，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白墙”。这道长城均为夯土筑成，城墙基宽约20米，高约1.5米至2.5米。夯窝为圆形，直径10厘米。墙顶宽2.47米，现在它的主体部分已基本上被沙漠埋没。黑岱沟乡的长城，除土筑外，还用石块叠筑，内实碎石、黄土，墙内墙外均有战国早期城址古遗迹，下限止于战国晚期。故我们认为魏长城应是筑到内蒙古境内，《史记》的记载不能轻易否定。

《绥远通志稿·长城篇》曾以不少篇幅反驳魏长城没有到达固阳塞之说：“或疑战国时魏之国界未必能远及包头县境。然考《史记·匈奴传》，赵襄子逾勾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勾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我为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郭以自守。按《史记》此文观之，则今河套鄂尔多斯之西部为当时义渠戎所居，而其东部则魏之所有也。包头县境与广漠之全套，此适位于其东部之北端，安见魏之边界必不能远及(包头)县境乎？况以《水经注》考之，古固阳塞在今县治西，而固阳县又在今县治东，益信战国时魏之筑长城、塞固阳，必在今包头县境无疑……”这种反驳是很有说服力的。

魏河南长城，是梁惠成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所筑，北起卷城西北战国时黄河的东南岸，经阳武，过古济水，到密县止。这段长城又称“卷长城”。它是魏国防御韩国和楚、齐的边防工事，当秦国的

势力向东扩张、越过崤关之后，它也有了防秦的作用。

尽管魏国在河西、河南都修筑了坚固的长城，但并没有保住魏国的国土。秦国用张仪为相，执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魏国首当其冲。公元前332年，秦孝公夺取晋国的阴晋。张仪又在秦北部修上郡障塞，联接涇洛长城，成为对魏作战的前哨基地。公元前330年秦俘魏大将龙贾，夺取河西之地。公元前228年秦兵攻破魏长城，夺取魏上郡全部土地。魏国失去黄河西岸土地，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便失去屏障，成为一座危城。另外，尽管有卷长城勉强抵挡一时，但由于魏国君骄兵躁，先后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败于齐国名将孙臆、田忌，魏大将庞涓战死，大伤元气。此后，其国土不断被邻国蚕食，终在公元前225年为秦所灭。

(未完待续)

注释：

[1]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魏长城》，中华书局，1979年。

[2]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7页；寿鹏飞《历代长城考》，民国三十年印行本第2页。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大学教授)



弘扬游牧文化 实现富民增收

王 军

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提出：“把内蒙古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包头市“5421”发展战略提出：建设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达茂旗得天独厚的草原优势、文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为激发文化创造力，承接基地和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以举办节庆活动为抓手，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档次，带动三次产业转型升级，是达茂旗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做法。2013年，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包头市政府的共同支持下，达茂旗承办了首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2014年，又成功承办了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两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按性质分为文化、体育、旅游、商贸四大类，累计举办各类活动近300项，吸引游客170多万人次，带动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实现成功转型。

为了搭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平台，从2012年开始，达茂旗开始兴建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1700亩，工程分5期建设。目前已完成3期，包括主看台、分看台、赛马场、商贸区、蒙古包群、摩托车赛场、弱电系统、

停车场、LED屏等。为了规范那达慕文化产业园的运营，提升运营管理水平，2014年初，成立了那达慕游牧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全面负责那达慕文化产业园的管理。自公司成立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化运作的力度，积极开展了各类商演的招商活动。从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开幕至目前，已开展各类商业演出活动10场，包括开幕式、那达慕晚会、云飞演唱会、摩托车极限表演、武利平专场演出等，实现门票收入300多万元。

两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从外在表现层面看，主要呈现以下四大特点：一是群众性。80%以上的活动主体都是当地农牧民，由农牧民群众自己策划组织，受益者都是达茂老百姓，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原则；二是原生态，很多活动都把蓝天、白云、大草原作为大背景，都融入了牛、马、骆驼、勒勒车等游牧文化元素；三是创新性。整个游牧文化旅游节创新几乎无处不在，牛羊选美、勒勒车搬家、马铃薯套餐等比赛，既有趣味性，又有观赏性，深受各地游客欢迎。四是高规格。两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推出了一系列“国”字牌活动，开创了达茂旗文



达茂草原风光

文化旅游活动之最，其辐射带动影响巨大，仅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就有国字牌活动23项，自治区级活动15项，这些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提升了达茂旗的对外影响力。

从内在价值层面看，承办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主要实现了以下六大目标：

一是促进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首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完成文化旅游增加值5.47亿元，同比增长19.7%，占GDP比重达到3.3%。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期间，游客接待量达到95.5万人次，占总接待游客总量的62.7%；实现营业收入3.82亿元，占旅游营业收入总额的62.8%。仅开幕式期间，接待游客量突破17万，实现营业收入6900多万元。参与各项活动人数达到4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1%。带动当地相关行业实现营业收入9.52亿元，同比增长22.7%。其中：住宿餐饮业收入3.35亿元，批发零售业收入3.57亿元，带动其他相关行业收入2.60亿元。

二是促进了农牧民增收。借助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的举办，“达茂草原羊”“达茂马铃薯”“达茂石磨面”等绿色农畜产品，产销双旺，供不应求，年

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实现了以“质量”换取“价格”，带动了民族手工艺品生产经营的发展壮大。从2013年开始，连续两届举办牧民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已进行八大种类50多人的培训，培训学员制作的手工艺品，在那达慕期间被游客抢购。目前，仅百灵庙镇就有民族手工艺品、奶食品和民族服饰销售店18家，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其中，那达慕文化产业园有民族商品销售店5家，带动牧民20多户，仅那达慕5天时间销售收入18万元。文化旅游节期间，达茂旗农家乐、牧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全旗共建成农牧家乐360多家，能够一次性餐饮接待能力达4万多人、住宿能力两万多人。为解决游客住宿问题，动员百灵庙城镇居民开设家庭旅店120多家，在那达慕文化产业园开辟了蒙古包群150多项，以成本价出租给农牧民经营，可解决1000人的食宿问题。

三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举办文化旅游节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深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整个文化旅游节，传承文化的载体非常丰富，通过组织赛马，探究马文化的内涵；通过使用勒勒车，挖掘游

牧文化的真谛；通过制作白食、红食，展示蒙古族饮食文化的奇妙。举办擀毡节、马文化节、奶食文化节、哈撒儿祭祀、民族服饰展等，组织开展了搏克、射箭等传统体育运动，据统计，两届文化旅游节关联民族文化的活动占到90%以上。通过这些活动，许多尘封已久的民族文化被重新唤醒。为提升希拉穆仁旅游区文化品位，打造了《金戈铁马魂、草原祈福行》和《敖包相会》两场舞台剧，分别在红格尔敖包和希拉穆仁大剧院进行商业演出。达茂旗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哈撒儿祭祀文化之乡”“中国楚拉嘎好来宝文化之乡”“中国蒙古族游牧文化研究基地”，取得了“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永久举办地权”。敖伦苏木古城被列入“蒙古族源、元朝帝陵”国家保护项目，地区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

四是促进了生态保护建设。在文化旅游节的影响下，达茂旗有机牛羊肉迅速走俏，价格实现翻番增长，现在牧民养一只羊，等于以前养两三只；达茂的马匹也有了新用途，马产业蓬勃兴起，牧民养的马，



达茂旗那达慕马术表演

既可以参加比赛拿奖金，也可以用来让游客骑乘体验，如今培养一匹好马，就等于过去养10匹普通马，在这种利益的引导下，牧民养畜自觉从“贪多”向“求精”转变，从根本上解决“禁牧”和“禁养”的矛盾。

五是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据统计，文化旅游节期间，通过开设农牧家乐和家庭旅店，销售绿色农畜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参与各类赛马比赛等，有超过60%的农牧民都加入到与文化旅游相关的产业，户均收入增加30%以上，有效解决了“就业难”“增收难”的问题。老百姓就业问题解决了，有事做了，就会把精力和心思全部用在创业增收上，许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就减少了。

六是促进了达茂品牌的提升。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期间，每年接待记者300多人次，接待各地游客近百万人次，推出了一批达茂牌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达茂旗自驾游品牌开始形成，带动兴建了20处高档自驾游营地，达茂美誉度和对外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承办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将游牧文化打造成国内最具发展潜力的文化旅游盛会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将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达茂旗新兴支柱产业，成为欠发达地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将达茂旗打造成包头市文化旅游中心和自治区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委宣传部干部）



“草原丝绸之路”的探源（摘要）

卢明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00年间（即中国唐、虞、夏、商至春秋战国之际），在中亚、东北亚大陆北部高原的“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些民族“居无定处”，“逐水草迁徙”，为寻求良好草场，他们自蒙古高原不断南迁，进入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地区，形成“夷蛮戎狄，犹错处内地”，北方游牧民

族与中原的华夏族呈犬牙错居的局面。同时，这些游牧部族之间为争夺牧地，长途跋涉，进行大规模东掠西掳的角逐迁徙活动，逐渐开拓出起自辽东，经漠南阴山南北麓草原、戈壁，过居延海，跨祁连山，穿越河西走廊，进入青海草原，“然后由青海，向南跨越巴颜喀拉山脉、昆仑山脉进入藏北高原”，向北横越阿尔金山脉，入天山南北麓草原；再向西北越过阿尔泰

山，进入哈萨克草原，通向伏尔加河流域俄罗斯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稍后匈奴、突厥、柔然等亦由东北亚、中原逐渐西迁，在漠北的荒漠高台地上开辟了东起黑龙江、额尔古纳河中上游兴安岭，经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蒙古，沿萨彦岭、唐努山脉、阿尔泰山，跨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北岸的哈萨克草原，达伏尔加河、顿河、黑海、里海、威海北岸的俄罗斯第聂伯河等流域草原，最终抵达东





欧的捷克、匈牙利等草原地带的横跨亚、欧大陆的通道。此即继内亚漠南蒙古草原“草原丝绸之路”后另辟的一条贯通亚欧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交通干线。

古代草原地带文明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掠夺与贸易两种方式。沿“草原丝绸之路”活动的游牧民族，起初是用掠夺、征服的方式来获得文明世界的物质文化成果，其后逐渐受文明民族的影响，学会了通过贸易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进而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更加密切了与定居民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联系。

二

蒙古人是游牧、狩猎民族，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于中原和中亚的各定居民族。13世纪以前，蒙古人大体分为草原南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部落，北部森林地带从事渔猎业的“林木中百姓”。从公元10世纪，游牧在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流域森林、草原地带的蒙古人，经常“唯以牛羊驼马，皮毛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同时他们还与西夏、女真

和中原的商人进行交易。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草原丝绸之路”为蒙古人的西征南进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为蒙古社会从野蛮状态上升为有秩序的文明社会开创了机遇。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为了便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和通达军情、政令，并为使草原上的亚、欧交通干线南北贯通，增进蒙古各汗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在蒙古草原“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林、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由官方维护。这3条沟通漠南、漠北草原地区的交通驿站，对当时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大帝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布达政令”，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前四代的蒙古汗王宫廷都是建立在漠北的蒙古高原上，为了便利于东西方交通、贸易发展，先后设置了通往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诸汗国的驿道，进一步维护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13世纪的阿美尼亚著名史学家基拉科斯·干札克指出：在蒙古征服时代，蒙古

统治者大力奖励商业贸易，给予商人种种特权。

当时东欧、中亚和中原商贾，将货物运输到漠北蒙古的哈刺和林和元大都（北京）等地贸易。意大利著名的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其父和叔父一行3人，于1271年离开威尼斯，从地中海东岸登陆，沿“丝绸之路”东行，穿越叙利亚、伊朗和中亚沙漠地带，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再逶迤向东，跨河西走廊，进入“草原丝绸之路”南道，经居延海，历3年半的艰辛跋涉，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上都，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重用。据《多桑蒙古史》载：次年“波斯人马思忽惕之父牙豁卜为大商，1276年自忽必烈驻所还”，他也是从事蒙古贸易的巨商之一。

三

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末，无论是居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古人，或是进入中原、中亚和东欧国家的蒙古人，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经济生活、习俗风情



蒙古人奶食文化



蒙古族娶亲表演

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蒙古人原以游牧、狩猎为本业，当蒙古人东征西伐，沿着“草原丝绸之路”将中原和西方定居民的商业、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引进到蒙古社会时，来自东、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等也逐渐浸透到蒙古社会中并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蒙古人的居住、饮食、习俗、风情等方面，也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粗放型游牧经济、文化形态，向定居民族的文明靠近、转变。逐渐由“居无定处”的狩猎、游牧业生产方式，转向定居、半定居的畜牧业兼手工业和粗放型农业的生产方式，从而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地带，出现了一些以商业贸易、手工业作坊和运输业生产为主的城镇；在从前的游牧地区，出现了连片的或“孤岛”型（即周围是牧地其中有小块耕耘土地）的农耕土地，一部分河流沿岸土壤肥沃地区，开垦为粗放的粮食、蔬菜等多种经营区域。

（二）从“毡帐百姓”向“板申”定居、半定居过渡。蒙古人长期过着“鞍马为家”“车帐为室”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



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展展品

活，当时成吉思汗的“宫闱”和出征用的毡幕，也是较为宽畅、安适的活动式“毛毡帷幕”。13世纪以后，居于“草原丝绸之路”地带游牧的蒙古人，经常与已开化的相邻的契丹、女真人交往，从他们那里间接地接触到中原文明，并效仿中原式的民居，部分蒙古人从毡帐迁进半定居的“板申”汉式房屋。

（三）蒙古人由信仰原始的萨满教，逐渐变为信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11世纪前后，中亚波斯（伊朗）等穆斯林商人和希腊、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传教士，沿“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蒙古高原，并开始在蒙古人中传播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当时，游牧于漠北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蒙古克烈部（亦称“怯烈”“客列亦惕”等）和漠南阴山北麓的汪古部都已有蒙古人开始信奉了伊斯兰教和景教，这些部落统治者有的还取了基督教的名字。

13世纪以后，经“草原丝绸之路”，来自中亚、西方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在蒙古草原日益盛行发展。据当时波斯文著作《塔巴合惕·纳昔儿》载：

“在拔都的营列和部落那里，建立了清真寺，寺内有信徒的团体、有主持公共祈祷的人和司祈祷时间者……伊斯兰教徒在他保护下安居乐业。”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路经乃蛮部时，看到那里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有很多人都是“脱里基督教徒”（景教），“正如他们散布说撒里答是基督教徒，蒙哥汗和贵由汗也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徒比对其他人更尊敬”。他在蒙哥汗的宫廷里，见到有一名年轻的基督教妃子，“他（蒙哥汗）很爱她，她给他生了个女孩”。

13世纪初，当窝阔台指挥蒙古军进西藏时，便把藏传佛教（喇嘛教）高僧请到蒙古地区，请他们授法传教，从而把佛教引进蒙古社会。14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发展普及，并取代了萨满教。

（四）蒙古人原先无文字，最初和古代的其他民族一样，用刻木结草等方法记事。1206年成吉思汗由“草原丝绸之路”出兵西征，灭乃蛮部，擒获太阳汗师傅塔塔统阿命其教授“太子诸王以畏兀字写蒙语”，从此，蒙古人始用畏兀儿文字记载本民族发展的历史变化。其后，在13世纪中期，忽必烈又延请西藏佛教法师八思巴为蒙古人创造了“八思巴文”蒙古文字，成为当时官方文书采用的文字。此后，在蒙古贵族子弟和寺院僧侣中，培养出一些懂蒙、藏文的人才，从而使蒙古民族结束了“俗无文籍”，用刻木结草记事的历史。

（本文摘自2014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游牧文化论》）



汪古部、 敖伦苏木古城 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李健民

一、汪古部和敖伦苏木古城的历史背景

汪古部，古族名。又称雍古、王孤等。来源于沙陀突厥。辽金时游牧于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北地带，先后附属辽金，为金守护边壕，与汉族联系密切，文化素质较高。统治阶层信奉景教，属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13世纪初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时，因汪古部追随其创建大业，乃归入蒙古，并与之联姻。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被封为八十八功臣之一，论功授予五千户，下谕令其子孙世代封王。在整个元朝时期，汪古部共有4人封为北平王，3人封为高唐王，3人封为邳王，8人封为赵王。成吉思汗还将自己的三女儿阿剌海别吉嫁给阿剌兀思义定“世婚世友”。元朝先后

有16位皇室公主下嫁汪古部首领。

敖伦苏木古城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35公里处。是元朝德宁路所在地，为汪古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交通中心。在元朝鼎盛时期，汪古部的领地东至乌兰察布兴和镇，西到今巴彦淖尔的乌拉特草原，北达大漠，南临黄河流域。敖伦苏木古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东西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还是调阳道、白道穿越阴山通向漠北的交通枢纽。

二、汪古部和敖伦苏木古城相关的考古发现

汪古部历史悠久，其文化遗存以敖伦苏木古城最为丰富。上世纪30年代瑞典



人斯文赫定和华人黄文弼等先后在百灵庙喇嘛寺之北发现一座城市废墟，包括王府、景教寺院、喇嘛佛教古庙等宗教建筑遗址。出土了石龟、石塘、石破臼、罗马风格的小石狮头、花纹贴面砖等遗物。尤其是出土的《王傅德风堂记》石碑，详细记载了汪古部历任王傅之事。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地即为汪古部首府德宁路之所在。敖伦苏木，取自蒙语，意为许多寺庙之地。敖伦苏木古城附近文化遗存分布集中且十分丰富。考古工作者在古城西北的毕其格图好来墓地清理了两座石停墓，石材内侧雕刻人物、动物、花卉图案；还出土了金花银碗及碗托。大苏吉乡明水墓地出土遗物很多，其中的丝织品尤为精彩。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洞室墓，死者为男性，身着织金锦大袍，头戴织锦风帽，足着革丝靴套。随葬品有高足金花银杯、葡萄酒瓶、桦树皮盒等。敖伦苏木古城东北墓群，地表常见石头圈遗址，多被盗扰。该墓地发现用汉、古蒙古文、古叙利亚文3

种文字书写的“泰定四年”（1322年）景教残碑。额尔登敖包古城西部山梁阳侧的墓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豆青釉刻花高足瓷杯、蓝釉黑花带盖瓷罐、钧釉碗、白瓷碗，玉、料质的心形佩饰，石砚，银杯，金杯，铜耳环、铜管等。上述达茂旗境内的汪古部墓葬，多数是元代的，少数早至辽金时期。

达茂旗境内汪古部古城除上述敖伦苏木古城和额尔登敖包古城和沙贝库伦古堡以及小文公乡的小城壕古堡等。这些古城街道、建筑遗址仍清晰可辨，城内遍布砖瓦陶片及钧窑、龙泉窑、定窑、磁州窑等几大窑系瓷片。城外亦多有居民区遗址。

三、汪古部和敖伦苏木古城的历史意义

达茂旗境内考古发现的诸多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以充足的实物证据，清晰地反映了汪古部的兴起和敖伦苏木古城的繁荣经历，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显露出蒙元帝国确立和发展的局部缩影。敖伦苏木古城是元代蒙古高原上闻名的大城市，也是欧洲文明和东方文明融会的丝绸之路的枢纽，以及沟通西北蒙古高原和中原内地的要冲，因而具有独特的人文地理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考古价值。敖伦苏木古城尚未进行大规模正式考古发掘，有待今后更深入的工作，必将取得新的巨大收获。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

与百灵庙战役

马金中

一、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

（一）策划

1934年4月，经国民政府同意，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为委员长，锡盟盟长索特纳木喇布坦、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副委员长，锡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为秘书长。因云王、索王、沙王很少过问蒙政会事务，蒙政会实际由德王一手把持。“蒙政会”，组建了蒙古地方保安队，至1935年秋，保安队员发展到千余人。

1935年以来，日寇侵占我绥察地区，极力拉拢德王。1935年底，日本军方邀请

德王赴伪“满洲里”新京访问，许诺支持“蒙古独立”，并给予经济援助。德王与日寇的勾结步步加深。为了揭露日军侵略阴谋，团结争取蒙旗保安队，促其早日反正，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动员云继先到保安队做教官，又派中共党员朱实夫、赵诚、云清等人打入保安队，做地下宣传鼓动工作，乌兰夫、奎璧、李森等也曾先后赴百灵庙了解情况、传递信息、商讨对策。

1935年秋冬之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百灵庙。云清、赵诚等党员，以及云蔚等党外的骨干分子，两次在百灵庙的东山坡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能否迅即发起暴动，组建“红军响应队”以及排除德王势

力，使蒙政会成为抗日的机构等事宜。

1936年春节前，赵诚、云继先、朱实夫等回土默特旗向云泽（乌兰夫）报告情况，商议对策。乌兰夫当即指出：“一旦德王公然在日本的操纵下搞起独立运动，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暴动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是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有削弱德王势力的打算，即电邀国民党要员巴文峻由南京前来绥远，密商对策。

1936年2月，德王由百灵庙返回苏尼特右旗，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设日本顾问部，且改元易帜，公开投日。当时，百灵庙蒙政会的事务由顾问敖云章和秘书吉尔格郎代为处理。保安处帮办宝道新（墨尔根巴图尔）和总队部书记长张启祥等人虽主持和训练保安队，但因该队多数官兵系土默特旗人。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云继先、朱实夫的手中。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云继先，曾留学于苏联学习军事的朱实夫等人一向对德王的亲日路线表示不满，存有戒心。德王一意孤行，决定把蒙旗保安队并入“蒙古军”建制，移驻嘉卜寺（化德），并派日本军官充当顾问，事态发展非常严重。经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多次宣传鼓动、组织策划，暴动时机已成熟，保安队爱国官兵抗日情绪高涨，积极呼应武装暴动的号召。

（二）暴动

按照暴动计划，将在1936年2月22日23时30分开始进行。但到21日，云蔚发现敌人动态异常，随即与云继先、朱实夫商议，决定提前24小时举行暴动。当晚23时

30分，武装暴动队伍兵分五路出击：第一路袭击德王的乌淖守备队，解除武装威胁；第二路进攻军械库，夺取枪支弹药；第三路攻打稽查处的看守所，释放被押士兵，击毙蒙政会稽查处主任李凤诚；第四路捣毁电台，切断德王与外界的通讯联络；第五路抄袭会计科，打开银柜，焚烧帐目。

22日凌晨2时，暴动队伍完成了各项任务后，在百灵庙南营盘集合，由云、朱等人率领，趁夜色朦胧，在茫茫雪原上向武川方向进发。暴动队伍行至达尔罕旗黑沙图地方，便遭到蒙政会派来的汽车及骑兵的追袭。战斗打得很激烈，因雪大路滑，汽车行驶不便，数小时后，追兵即返回百灵庙。下午2时左右，暴动队伍安全到达距百灵庙50余公里处的岔岔村和二份子村，并电召驻乌拉特中旗的保安队第二中队，与主力会合。至此，暴动的全部官兵约有1000余名，暂编为2个大队，6个中



百灵庙战役中的晋绥军部队

队，2个特务队。25日，起义部队在归绥发表起义通电，揭露德王投靠日本的行为，阐明“在激于爱国热忱不背叛国家原则下，举行军事暴动，脱离德王”。

（三）改编

当暴动队伍在二份子准备休整时，傅作义部驻武川的孙兰峰421团两个加强营赶到二份子村，借“慰问”之名，包围了暴动队伍，用欺骗的手段，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不久，该部队被拉到大青山南，改编为两个大队，分驻萨拉齐县的水洞沟村和归绥县的三两村。之后，由国民党中央给以“蒙古保安总队”的番号，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并发给月俸10000元，购置军马费5000元。

同年9月，德王派亲信托巴、达奥、李春林等人，到暴动队伍的驻地，与原德王的部下章文锦等联络，挑拨离间，策动不纯分子哗变，枪杀了暴动领导人云继先，将部分人员拉回百灵庙，许多官兵也相继愤然离队回了家。

正当暴动队伍处境艰难、面临崩溃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派出有志之士和优秀人员，为这支部队输送了新生力量。除云清、赵诚等党员重返该部工作外，乌兰夫等人也参加到这支部队。不久，蒙古保安总队被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中共党员白海风任旅长，移防包头附近。蒙旗独立旅是新三师的前身，乌兰夫在其中的公开身份是代理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几经磨难，逐步壮大，百灵庙暴动的志士们始终是构成它的主干。

1937年10月，日伪军进犯归绥，蒙旗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

独立旅从驻地固阳县驰骋而至归绥南郊大黑河一带，与日军伪蒙军激战两昼夜，予敌以重创。后南渡黄河在伊盟坚持抗日，1938年5月，扩建为新三师，乌兰夫担任新三师地下党委书记，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百灵庙战役

（一）战前准备

百灵庙是绥北军事要地，是乌兰察布盟最大的喇嘛庙之一，也是沟通南北、贯连东西的交通要道。它距绥远省会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西北约170公里。其地势险要，为绥远北部主要屏障，也是德王蒙伪组织的巢穴及日军进犯绥远的桥头堡。

1936年11月中旬，傅作义部侦知日伪军由察北用汽车百余辆运送大批武器弹到达百灵庙，企图由百灵庙向绥远各地进犯。傅将军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奇袭百灵庙，歼击守庙之敌，毁其巢穴，保卫边疆。他令骑兵二师师长孙长胜为前敌总指挥，第211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指挥骑兵2师三个团、第21旅两个步兵团、第17师刘效曾步兵团、附山炮兵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和装甲车队各一，约5000人，秘密向指定地点二份子、公胡洞一带集结待命。

同时，派35军参谋人员化装成商贩到百灵庙侦察地形，将其周围地形工事构筑及兵力布置等情况绘制要图，为傅军作战提供了方便。是时，庙内及周围有伪蒙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骑兵约1800人，德王所属蒙旗保安队700余人，其他人员300余人，总兵力3000人左右，屯积粮草、枪炮弹药、汽油燃料等军需物资，并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百灵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临战之前，孙兰峰亲率团以上军官，在距百灵庙20余里的高沙梁一带进行秘密侦察，并确定了各部队的行军路线、集结地点、攻击准备位置、攻击方向等。

（二）战斗部署

11月22日，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集结完毕。孙长胜、孙兰峰即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下达进攻命令：（1）第21旅422团、

骑兵第三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队和装甲车队为主攻部队，419团张成义部为左梯队从百灵庙正面攻击，直取百灵庙；以421团刘景新部（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派一部先期到达该庙东北通往滂江的道路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其归路。

（2）刘效曾步兵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西地区，先行向敌袭击，以吸引敌人注意力，给主攻部队创造有利条件。（3）骑兵第一、二团绕到百灵庙以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攻击北侧，占领北山，控制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4）步兵第421团第一营、韩天春营、山炮营、苏鲁通小炮队、装甲车队为预备队，置于百灵庙东南高地附近，其他部队随指挥部在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小高地附近。（5）各部队均须在23日午夜24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构成通讯网，听候总指挥部电话命令，开始攻击。

（三）收复百灵庙战斗

11月23日深夜，天气寒冷、草地积雪尺余。各攻击部队按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第419团张诚义部率先秘密接近距百灵庙南约3华里处。午夜24时，各攻击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刘效曾团在百灵庙西侧吸引敌人注意力，张成义419团向庙南侧发起总攻。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指挥督战，集中全部火力拼



纪念抗日战争、瞻仰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遗址

命阻止傅军前进，激战达3小时也未见结果。孙长胜、孙兰峰果断下达命令，拂晓前必须全歼百灵庙之敌，一举收复百灵庙。山炮营及苏鲁通小炮队在参谋长袁庆荣的指挥下，集中炮火向女儿山之敌进行摧毁性射击，掩护装甲车队和步兵攻击，并向百灵庙固守之敌猛烈射击，支援步兵向庙内进攻。孙兰峰副总指挥亲到前线指挥战斗，韩天春营长率领装甲车队和该营第三连，乘6辆汽车从东南山口向敌猛攻。百灵庙北面的蒙政会驻地和汽油库中弹起火。刘效曾团也由西面突破敌人阵地，向庙内进攻，骑兵刘景新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飞机场，切断了敌人后退之路。经过激战，终将敌阵地防线突破。激战中，伪蒙古军一排官兵举行战场起

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和伪蒙古军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等乘汽车仓皇逃往大庙，敌军惊慌失措纷纷缴械投降。24日上午8时，敌全线崩溃，傅军全歼敌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兵1300余名，内有日本人尸体20余具，伤敌600余名，俘敌400余名；缴获各种炮13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600余支、无线电台3部、汽油500余桶、面粉两万余袋和其他军需物品等。傅军亦伤亡300余名。对俘虏优待，每人发给银洋5元，面粉一袋，释放回去。

（四）百灵庙反击战

傅作义部攻占百灵庙后，除留421团一个营警戒防守、修筑工事外，其余各部

均在当天下午撤至原集结地待命。日伪不甘心失败，于11月25日调集百余辆汽车陆续载运援兵三千余名到大庙，并有王英部骑兵两千余名从商都以北绕过土牧尔台，经草地向西北方向窜犯。孙兰峰旅长立即率部返回百灵庙，重新部署，迎击来犯之敌。从女儿山东、沙河西岸起分成两个防区构筑工事，西面为刘景新团，东面为张成义团，其余为预备队。12月3日凌晨4时许，在刘景新团阵地前，发现头罩白毛巾、身上翻穿白茬皮袄的敌人，顺雪坡向庙方蠕动。当即被该团士兵击退。张成义团阵地前也有600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沙河东岸山头猛烈进攻。西南角被刘团击退之敌，又增加到800人，向各阵地发起波浪式的冲锋。刘团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节节后退，诱敌深入袋形阵地后，三面夹击，毙敌百余人。上午9时许，敌机分两组轮番轰炸百灵庙周围阵地。一架敌机被击伤后，慌忙逃走。这时张团阵地前之敌又在炮火掩护下向庙方猛冲，傅作义部绕到敌之侧背两面夹击，将敌击退。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反扑，孙兰峰旅长决定当晚出击，命令刘效曾团抽调精壮士兵4个连为袭击队，配有骑兵一队，汽车两辆，追歼逃窜之敌。这次反击战共歼日伪军700余人，伪“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被击毙。

（五）大捷的影响

百灵庙大捷传到全国各地后，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歼灭了敌人的威风，人心振奋，欢欣鼓舞，军民无不扬眉吐气。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即电傅作义：“绥远抗战胜利，为全国抗战的先声”，给予高

度评价。并派南汉展携款慰问和赠送锦旗，绣有“为国御侮”四字。各地报纸竞相刊发“号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华侨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慰劳团到归绥、百灵庙、大庙等地劳军慰问。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热情高涨，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抗战局面实行全面抗战。全国各大城市学联大力支持绥远抗战，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到街头宣传并募集慰劳品输送前线。北平学联发起“万件皮衣运动”，提出“千针缝、万针缝，送给绥远战士杀敌打冲锋”。何香凝女士为激励百灵庙前方杀敌将士，组织了“上海妇孺抗日慰劳团”，成员有著名电影艺术家陈波儿、崔嵬，女作家吴似鸿、熊玉兰以及陶行知先生所组织的儿童团团员等。1937年2月23日，“慰劳团”随傅作义将军到达绥北重镇百灵庙进行慰问。演出期间，著名音乐家吕驥也来绥教唱救亡歌曲，并谱写了《三十五军军歌》。著名记者范长江以专题翔实地报道了绥远抗战的经过，称赞说：“这次战役，揭开了民族光荣历史的新页。”百灵庙战役后的短期内，仅来自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捐款一项就达300余万元。

1937年3月15日，绥远省各族各界30000余人，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绥远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汪精卫、山西省的阎锡山等均亲自来绥参加。百灵庙战役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虽不是一个大的战役，但它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国内外反响极大，在中华民族抗日史上占据着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达茂旗委老干部局）

赴百灵庙慰问抗战将士的爱国团体

刘建禄

1936年6月，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热河、察北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又将魔爪伸向绥远。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35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基于爱国热忱和民族大义，从当年7—11月，率部奋起抗击，击退了日伪军对土牧尔台（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土牧尔台镇）、兴和（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等地的进攻，取得了两次保卫红格尔图（今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被日伪窃据的百灵庙（今包头市达茂旗驻地百灵庙镇）、大庙（即锡拉木伦庙，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境内）等北疆战略要地，史称“绥远抗战”、“百灵庙大捷”。取得“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第一次既收复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的胜利。

绥远抗战胜利特别是“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后，举国欢腾。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电贺傅作义，称誉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雄将士”。不久，中共中央派出慰问团赴绥慰劳，赠送绣有“为国御侮”的一面锦旗。国民党蒋介石等军政要人发来贺电，国民政府颁布嘉奖令，派出赴绥宣慰团。天津《大公报》评论道：“这次绥远抗战胜利，不仅取得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地位，而且已作为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抗战热潮，仅到1936年底汇至绥远的捐款就达300万银元之巨。许多爱国团体和进步人士除了捐献款物、发出慰问函电外，还组织慰问团组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绥远慰劳军队。其中许多慰问团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组成的，有的地下党员负责带队或作为成员。

来到绥远的慰问团组，主要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进行各种慰劳活动。但也有一些慰问团组，顶风雪冒严寒，翻山岭过草原，北赴百灵庙前线慰劳，在百灵庙的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篇章。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对当时爱国团体赴百灵庙的慰问情况整理如下。

太原女师赴绥慰劳看护队赴百灵庙的慰问看护



绥远抗战伤员与太原妇女看护队队员合影

绥远抗战的胜利的消息传到山西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发起“入绥运动”，组织各界代表赴绥远前线慰问。太原女师的师生们首先响应，组成了“太原女师赴绥远慰劳看护队”。牺盟会执行委员、中共地下党员宋维静担任队长，带着26名太原女师的师生乘汽车从太原出发北上，在大同改乘火车，于1936年12月21日抵达归绥。在归绥，宋维静代表慰问团，将一面绣着“民族英雄”的锦旗赠给抗日官兵，傅作义手捧锦旗再三地表示感谢。然后，宋维静带领慰问团到部队为将士们演出节目，到绥远公立医院进行护理工作，并走向街头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

宋维静还向傅作义将军提出，要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战最前线的将士。傅作义将军考虑到她们的安全问题，也担心她们受不了那里的严寒和艰苦，起初坚决不同意。但在宋维静的一再坚持下，傅作义将军答应由她带领四五人为代表，前往百灵庙前线慰问。

宋维静一行到百灵庙后，在向将士们进行慰劳、赠送慰问品之后，又提出留下来看护伤员。经同部队的领导几次协商，她们到百灵庙的天主教会医院去做护理工作。教会医院的医疗条件十分艰苦，伤员的护理也跟不上。宋维静一行不但协助医生给伤员换药治疗，帮伤员们洗衣服，洗



傅作义将军像

脸洗脚，还给伤员演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宋维静说：“我们来完全是想替受伤的官兵看护，减轻他们的痛苦，表示我们的心意。”慰劳看护队员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不嫌脏不怕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伤兵。不少士兵表示：“等伤好了，我们一定再上前线和小鬼子拼到底，以报你们的抚慰之恩！”

1937年1月初，国民党军医署在归绥成立了一个临时伤兵医院。宋维静一行随同百灵庙天主教会医院的伤员也转到了这个医院，她们的看护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后，直到2月初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太原。傅作义将军在赠送给她们的锦旗上写道：“妇女身，壮士志。赴绥远，护战士。”

第一批上海妇女儿童抗日慰劳团赴百灵庙的慰问

1937年1月，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总部在上海）理事的革命老人何香凝，为支援绥远前线抗日杀敌将士，牵头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抗日慰劳团，成员有进步电影演员陈波儿、崔嵬，以及作家、教师、陶行知儿童团团员等，共8人。何香凝老人



宋维静老人

还个人出资购买了药品等慰问品。途经天津、北平宣传义演时，一些进步妇女和女大学生主动报名参加了慰劳团，成员总数达到30余人，由陈波儿、张晓梅（北平地下党员）带队。该慰劳团乘火车1月21日到达归绥慰问。1月23日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乘汽车到达百灵庙进行慰问。

大战后的百灵庙已破败不堪，不少殿宇只剩下残垣断壁，四周墙上枪眼仍存。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大殿中召开将士大会欢迎上海慰劳团。傅将军在讲话中说：

“这一次绥远抗战，全国各地募款、捐助物品，更有许多兄弟姐妹到前线来，这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由于全国人民的支持，由于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我军收复了百灵庙。百灵庙大捷，是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全体将士将乘胜前进！”接着陶行知儿童团团员们演讲。他们愤怒地挥动着小拳头说：“日本帝国主义杀死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儿童团也要和伯伯、叔叔一起杀敌报仇！”全场将士屏息静听，鸦雀无声。小团员们演讲完毕时，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演讲后，首先演出了慰劳团自编的抗日短剧《张家店》，表现了百灵庙将士在冰天雪地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悲壮场景，碧血丹心，感人肺腑。接着演出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陈波儿演姑娘，崔嵬演老父，其他成员演群众。当陈波儿演到姑娘哭诉其父女受到日寇残害的悲惨身世时，台上演员流泪，台下将士抽泣。最后，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汇成了雄壮的抗日交响乐。

大会结束后，慰劳团来到附近的伤兵医院。伤员们都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有的伤员虽然伤势很重，仍以巨大的毅力克制伤口的剧痛。慰劳团员们在病床前轻轻地唱起了《抗日慰问歌》：

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
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



陈波儿（前中）率华北敌后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出发，赴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

受了极荣誉的伤，
躺在这病院的床上。
帝国主义为着要逃脱深刻的恐慌，
他们是这样的疯狂，
自从占领了我们的北方，
又进攻到我们的长江，及所有的边疆。
他们要把中国当作一个屠场，
任他们杀，任他们抢。
听啊，飞机还在不停地丢炸弹，
大炮还在隆隆地响。
我们拼着最后的一滴血，
守住我们的家乡！

伤员们听着歌声，都激动得留下了热泪。许多伤员坚定而断续地回答：“我们一定——尽快——养好伤，早日——重返前线杀敌——杀敌！”

慰劳团还深入到连队去教唱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抗日救亡歌声响彻百灵庙，战士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不断高

涨。

慰劳团离开百灵庙后又到集宁进行了慰问，1月27日返回北平。

第二批上海妇女儿童抗日慰劳团赴百灵庙的慰问

1937年1月26日，经陈波儿的丈夫阮泊生组织，由上海地下工作者陈明（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女大学生张瑞芳、陈桂英、陈劲章及2名华侨共6人组成第二批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带着药品、咸菜、香烟等慰问品，从上海出发赴绥远慰劳。途经北平时，北平地下党组织派出师大进步女大学生曹国智化名带队。

慰劳团2月9日到达归绥后，受到傅作义将军的接见。在归绥慰劳了两个伤兵医院。2月10日是除夕，他们乘长途汽车前往乌兰花（今四子王旗驻地乌兰花镇）。由于天气严寒，每个人都身穿军用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脚蹬长皮靴，但仍寒气逼人，口里呼出的气就在眉毛上结了冰。当晚乌兰花附近慰劳了从百灵庙调回来的骑兵部队。11日到达大庙慰劳。大庙喇嘛讲，他们是大庙建成200年来第一次来这里的南国女儿。

当天黄昏时，慰劳团从大庙到达百灵庙东的山口处。一个士兵做向导，领慰劳团穿过战壕，避开地雷区，来到当地条件最好的住处。

第二天早上八时，驻地官兵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整队欢迎慰劳团。慰劳团代表上海、北平各界对将士们英勇抗敌、血战到底的精神高度赞扬，并送上了慰劳品。

半个世纪后，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曹国智曾深情回忆道：

从大庙到百灵庙的时候，天快要黑了，山头上布满岗哨。他们没有皮大衣，也缺少手套。百灵庙是千里沙漠中的一处寺庙，炸弹和炮弹留下了破坏的痕迹。我们住在原来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房子里，屋顶上通夜有弟兄们放哨。在风雪的呼呼声中，能听见弟兄们因为冷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百灵庙前线的将士永远值得怀念！

别了，百灵庙！别了，大庙！别了，乌兰花！到现在整整五十年了。到百灵庙劳军时，我是一个21岁的女学生，现在我已71岁的老妪了。那大青山上的积雪，那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的战士，那百灵庙前雄壮的军号声，那在冰天雪地通夜放哨的战士的脚步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激励我奋然前行，永不衰退！

其他慰劳团在百灵庙的慰问

广西工商、文化、妇女等各界代表组成的抗敌救国代表团，1936年12月2日携带捐款和饼干、牛肉罐头、毛巾、卫生衣、袜子等慰问品，分乘两辆汽车北上，历时22天到达归绥，并到百灵庙等地慰问，从绥东返回广西。

总部设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在南京地区募集了总价值约1万银洋的各种慰问品。1937年2月9日他们派出代表，携带慰问款物，先在归绥祭奠了阵亡将士，然后到武川、乌兰花、百灵庙、大庙、红格尔图、兴和等地慰问，2月29日返回南京。

全国各地慰劳团对绥远各地抗日将士的慰问，特别是对百灵庙前线部队和伤病员的慰问，极大地鼓舞了绥远各族军民抗日热情和坚强斗志，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必胜信念！

主要参考资料：

一、《绥远抗战》，内蒙古政协文史委编，1986年12月出版，《内蒙古文史资料》总第25辑；

二、《战斗在绥东》，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编，2011年4月出版。

（作者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草原英雄小姐妹

樊尚荣

龙梅和玉荣是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人。1964年2月9日，年仅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在放羊时遭遇暴风雪，她们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舍生忘死地保护了集体的羊群。龙梅被冻掉了左脚拇趾，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而她们放牧的384只羊，仅有3只被冻死。当年3月，自治区党委授予她们“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光荣称号，龙梅和玉荣的事迹传遍了全国。

舍命护羊群

1964年2月9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春节将至，喜庆的气氛笼罩着达尔罕茂明安大草原。可是就在这时，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向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生产大队逼近了。狂风、暴雪铺天盖地，似乎要吞没广袤草原上的一切。

这天一大早，龙梅和玉荣的阿爸便去帮另一家牧民粉刷房子了。包放公社384只羊的任务就落到了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姐妹俩肩上。羊儿欢快地从圈里跑出来，啃着草儿向前走。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暗，狂风大作，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骤然袭来。气温降至零下37度，西北风越来越猛烈，羊群开始顺风狂奔。龙梅和玉荣急忙拦住羊群往回赶，但是暴风雪却挡住了归路。怎么办？丢下羊群找个地方躲躲？她们想起了阿爸的话：“羊是集体的财产，是集体的命根子，一只也不能丢！”她们放弃了逃生的念头，也没有回去找阿爸，因为她们担心丢了羊。

暴风雪更加猛烈了，龙梅让玉荣回去叫阿爸，玉荣顶着风掉头就往回跑。跑了一段她一回头，看到姐姐一手持羊铲，一手挥舞着脱下来的皮袄，艰难地左拦右



龙梅玉荣在母校和孩子们交流

挡。不能丢下姐姐！她又返身跑了回来，和姐姐一起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追赶。

小姐妹获救

天渐渐黑了下来，积雪将近一尺厚。饥饿、寒冷、疲劳折磨着两个小姑娘，但是羊群没有停下来，龙梅和玉荣也不能停下。

东方渐渐发白，姐妹俩已经跋涉了30多公里，来到了白云鄂博车站附近。突然，龙梅呆住了，她喘息着问玉荣：“你的毡靴子呢？”玉荣说：“这不是在脚上

嘛！”仔细一看，玉荣的脚成了两个大冰砣子，她的毡靴早就跑丢了。

龙梅要把自己的毡靴脱给妹妹，但是她的手指不听使唤，而且她的毡靴已经和脚结结实实地冻在了一起。姐妹俩相互搀扶着，赶着羊群，一步步挪向铁道。玉荣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软软地晕倒在雪地上。

龙梅把妹妹拖到一处避风的大石头旁，聚拢羊群，踉跄着向车站走去。来白云鄂博车站送朋友的哈斯朝鲁及其长子娜仁满都拉发现了龙梅，赶紧与几名铁路工人一起抢救这对小姐妹。2月10日下午，

龙梅和玉荣被送入了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医院。

在白云鄂博铁矿医院的工作总结上有这样两组文字记录：

“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有水泡形成；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姐妹俩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龙梅失去了左脚拇趾，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而她们放牧的384只羊，仅有3只被冻死，其

余安然无恙。

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亲笔题词，号召“我区各族青少年要努力学习她们的模范行为和高尚品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还授予她们“草原英雄小姐妹”光荣称号。

很快，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动人事迹被拍成电影、话剧、京剧，还被编入小学课本，教育和激励了无数少年儿童。

小姐妹精神依旧

时光荏苒，当初风华正茂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岁数。每当提及当年的事迹，姐妹俩总是淡淡地说：

“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我们俩的事迹其实很普通。”

1970年，龙梅如愿光荣入伍，在部队期间被送进包头市医学专科学校和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进修学习。1976年转业，先后任中共达茂旗委副书记、包头市东河区人大副主任、东河区政协主席等职，直到2013年退休。

玉荣1974年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初，她被调任为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担负起了残联繁重的组建任务。2013年1月份，调内蒙古政协工作，先后任办公厅副



龙梅（右）玉荣参加奥运火炬拉力活动



11岁的龙梅（左）和9岁的玉荣（右）在自家屋前

主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现任政协副主席。

2014年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命名50周年。10月9日，自治区团委主办的“中国梦·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草原英雄小姐妹50年分享活动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50年前，那个风雪中的草原，那两位年少的蒙古族姑娘，还有那四处走散的羊群，她们的故事，你还记得多少？记忆的沙相聚在一起，画出了那份风雪中的美丽！”伴随着主持人充满磁性的朗诵声，龙梅和玉荣身着民族服装，迈着稳健的步子，款款走上分享会现场的舞台，与现场嘉宾和各界青年代表分享了她们50年前的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她们那么小就能做到为了集体的利益不顾自己的命，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她

们就是我们的榜样。”参会代表充满激情地说。

50年多来，蒙古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奋勇抢救集体羊群，教育和感动了几代人，成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经典范例。“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身上所迸发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依然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50年来，姐妹俩始终保持着牧人淳朴善良的本性，不以英雄自居，低调做人，充分发挥她们的身份效应，为公益事业奔忙。2008年，姐妹俩光荣地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

（本文作者系《北方新报》记者）



达茂旗境内的 旅蒙商及大盛魁遗迹

孟克德力格尔

清初，喀尔喀右翼部归附清廷之后，游牧与今达茂草原一带。广大牧民祖祖辈辈过着“毡房炊烟，以御风寒，牛羊酪浆，以充饥渴”的生活，与内地汉族之间的往来极少。

清朝康熙年间，本部诺尔亲王在乌力吉套海建成贝勒庙（即百灵庙），清廷赐名“广福寺”之后，庙宇的喇嘛僧人逐渐增多，各种商品的需求量也不断扩大。由于地处边陲，地势险要，贝勒庙逐渐成为漠南地区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

旗境最早的店铺商号是：从山西迁至归化城做蒙古贸易的复元魁（德胜公）、集义公等商号，路经贝勒庙通往新疆及漠

北大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行商的大盛魁也有路途分店。他们都在贝勒庙河东落脚，设有3家大店。

到了道光年间，俊德魁、义成堂等10余户行商纷至沓来。之后河东岸上院墙比邻，层沿相接，形成了南北1里多长的旅蒙商人贸易活动的繁华集市中心。随着这些商号向边疆草地涌进，一些自力经营的小商小贩也纷纷出入，由近及远，逐渐深入。到民国20年（1931年）至25年（1936年）间，河东行商发展到30余户，从业人员增至数百名，资本额达150多万元（银元）。主要商号有复元魁、集义公、公和堂、义长永、增盛长、杨大柜、德义公、



福裕泉、庆盛长等。

旅蒙商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绸缎、布匹、粮油食品、烟酒糖果、玉珠锦绸、金银首饰、砖茶糕点及民族、宗教用品和日用杂货等。其经营方式，除了在中心地带设店铺外，路途较远的牧区，采取冬春分头派出流动驼队挨门串户送货记账的赊购办法，把商品赊销给牧民。到了夏秋，牲畜膘满肉肥绒毛下来之后收回牲畜在贝勒庙附近的几处水草丰美的牧场上放牧，待内地牲畜及产品行情看长后，再赶到市场出售，这时驼马繁聚，牛羊成群，商贾云集，车马络绎不绝，最为红火。坐商运输驼队的骆驼发展到千余峰，是旅蒙商易货贸易的“黄金时代”。当时，以张家口、大同、归化城为据点进入西北贸易的旅蒙商驼队“后山驼路”经贝勒庙的就有4条，即张家口—乌兰花—贝勒庙—中公旗—新疆；大同—归化城—贝勒庙—中公旗—甘州；归化城—贝勒庙—中公旗—大库伦；归化城—贝勒庙—大库伦。

随着政治形势的动荡不安，旅蒙商的贸易活动也经历了兴盛和歇业倒闭的不同历史阶段。日伪时期，旅蒙商业趋于停滞状态。从张家口、大同、归化城越过阴山经贝勒庙北口的行商和就地经贸的座商日趋减少。贝勒庙成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根据地之后，旅蒙商交通汇集之地又遭到致命打击，损失殆尽。他们从经济上把蒙疆

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赚取高额利润的基地，相继设立“大蒙公司”“畜产公司毫日希亚”等，实行其经济垄断政策，牲畜和畜产品贸易都控制在日本垄断资本家手里，并强迫旅蒙商人经销“大蒙公司”商品，许多商户接连歇业倒闭，商铺房屋成为兵营，工匠人避难迁移，大部分小商贩迁居边远牧区从事流动性的贸易经营，贝勒庙坐商所剩无几，河东过去那檐瓦连接、商铺林立、驼铃丁当、车马奔驰、牧人往返的集市中心消散无踪，留下的只有一堆做历史印迹的残垣废墟。

1945年9月至1949年间，贝勒庙的坐商只有刘尚贤（商号永记）一家，从业人员12名，其余侯明、张玉德、张明、宋万祥等十几户行商都居住在牧区各苏木。

解放后，这些小商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入股建立公私合营牧场，走上了新生之路。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蒙古史研究专家，内蒙古哈布图哈撒尔祭祀代表性传承人。）



沉默的历史

— 达茂旗境内的古长城遗址

徐忠文

一、汉长城

西汉时期，达茂旗所处的地段属于匈奴族领地（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公元24年）。当时汉朝疆土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命徐自为（即徐光禄）在五原塞（今乌拉特前旗及固阳县一带）修筑长城，称之为光禄塞。

后人把它称为汉长城，当地人也把它叫作“边墙”。

汉长城是由两条几乎平行的长城组成，西边一条是起于武川县西南的石拉门独乡，向西北进入武川县与固阳县的交界处，出固阳县卜塔亥乡的边墙壕村进入达茂联合旗乌兰忽洞乡的保力图村，经西河

乡营路村、新宝力格苏木的巴荣坤兑、库伦、本红、白音珠日和苏木的那日图进入乌拉特中旗的城库伦苏木，后经乌拉特后旗进入蒙古国的南戈壁省，最后向西南折回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与额济纳河沿岸的长城相接，一直通到新疆的阿尔泰山脉。

东边的一条汉长城，从武川县境内向西北进入达茂旗坤兑滩乡上苏吉村，经乌克忽洞乡东河村、红格塔拉种羊场、百灵庙镇河东、巴音敖包苏木的巴音花嘎查、红旗牧场的白彦敖包嘎查，进入乌拉特中旗桑根达来苏木，后经乌拉特后旗与另一条汉长城共同进入蒙古国的南戈壁省。

汉长城主要是用石头与土构筑的，例如：百灵庙河东段汉长城是两边夯土墙当中填土筑成的。新宝力格、白音珠日和苏



木境内靠山一带的长城是砌石中间填土构成的。

汉长城由列城、墩城、亭燧和烽火台组成，列城之上每隔二三十里筑一座供瞭望侦察用的墩城，在墩城之间约5里建一亭隧，用来报警。亭隧应是亭子式的建筑，达茂旗境内的汉长城就有亭燧遗址，至今残存着砖瓦碎片，在亭隧的周围发现了一些古代陶器的残片。

汉长城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自然破坏比较严重，但它的遗迹至今清晰可辨。如果站在高处瞻望，汉长城连绵不断地横亘在广阔的荒漠戈壁之上，亭隧鳞次栉比，由此可以想象两千年前它的气势是多么的雄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修筑这样两条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长城，工程是多么的浩大。

二、北魏长城

北魏长城总长两千余里，是北魏时期明元帝泰常八年修筑的，所以后人也称其为“泰常长城”。

这条长城是北魏政权为了御防柔然南侵而修筑的，整个长城基本上分布于内蒙古中西部，西起于包头市固阳县，东至河北省赤城县。具体走向是从赤城到张北，进入化德，经商都、察右后旗、察右中旗、四子王旗到达茂旗的大苏吉、希拉穆仁，延伸到武川，最后终止于固阳。

达茂旗希拉穆仁苏木所在地北3公里，鸿记到白音淖尔嘎查的合教忽洞一带的北魏长城保存完好，遗迹清晰。

三、金长城

金长城又称金界壕或金堑壕。这是一条总长达5000多公里长的“万里长城”。

金长城是金朝统治者为了防御当时正在崛起的蒙古帝国而修筑的。它大约从金天会年间开始修筑，至永安二年（1198年）前后竣工。

金长城有两条，一条起于大兴安岭北麓，由根河南岸西行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直达蒙古国境内的肯特省德尔盖尔汗山。后人称之为明昌旧城。另一条东起嫩江西岸的莫力达瓦旗境，西止于包头市东南的黄河北岸。

达茂旗额尔登敖包苏木西南有段金长城保存完好，十分醒目。金长城的结构有别于历代长城。它的主体结构为外壕内墙（也有双壕双壤或前为副墙后为主墙中间堑壕的），城墙上附筑有烽燧、马面（突出墙外的墙台），靠墙内侧布置戍堡。所以金长城具有设施完善、布局合理、防御功能强的优点，可以大量屯兵，进可攻、退可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是比较先进的军事设施。

金长城在防御蒙古骑兵进攻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以后，强大的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所向披靡，金朝守将汪古部首领不战自降，归顺了蒙古，并率部参加了成吉思汗讨伐西夏的西征。金朝在强大的对手面前节节败退，最后直至灭亡，宏伟的金长城也没有挽救金朝的覆灭命运。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政协原副主席、调研员）

长生天的祝福

——达茂旗境内的著名敖包

刘茂云

敖包是历史上蒙古各部落为纪念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雄们而用石头垒成的石堆，也是天葬英灵的地方。敖包里一般存放英雄的遗物，石缝中撒上硬币或其他纪念品。祭敖包是草原牧民祈求风调雨顺、五畜兴旺、家人幸福的祭祖活动。当祭祖

活动结束后，牧民们还会在敖包附近举行传统的赛马、摔跤、射箭比赛。敖包也是驼路的路标。佛教传入后，祭奠活动和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使它在原有祭奠内容上增添了宗教色彩。

达尔罕旗主要有3座旗祭敖包，东有



文公敖包、北有那日图敖包、西有白云博格多敖包，每3年全旗轮流性大祭一次。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全旗要召开“楚古拉”，召集旗里的贝勒、贝子、协理、台吉、安本、梅林等大小官员，研究全旗大事，会上要决定祭敖包和召开“那达慕”大会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事项。

白云博格多敖包东南有一片开阔草地，有两块形如驼羊的大白石头，离敖包五六里路程，称查干宝特格。祭敖包的前两天，旗里官府、贝勒庙各大拉桑、各苏木以及牧民就来这里安营扎寨，搭起蒙古包、帐房，点燃篝火。人们还带来全羊、羊背子、奶食、油饼、炒米、糖块、烧酒等食品，准备向敖包献酬。平时难得一见的牧民聚集在一起，互致问候请安，叙谈一年的见闻和趣事。青年男女则利用良机，谈情说爱，喜笑颜开。悠扬的马头琴和四胡声，抒发着牧人喜悦的心情。

白云博格多顶上的敖包早已布置得威严肃穆。顶上插着三根玛尼杆，挂上蓝边白旗（达尔罕部军旗）和一把明晃晃的三股钢叉，用马鬃和绸缎做成的缨穗随风飘舞，各色彩绸制作的禄马风旗迎风招展，象征着祖先成吉思汗带病出征，所向无敌。

祭日清晨，人们三五成群，向敖包拥去，青年们快马加鞭奔驰在前方，长者则互相照应着将祭品带到山顶，摆放在敖包旁，双手合十，祭天、祭地、祭列祖列宗，并向敖包供放祭品。喇嘛们身着袈裟，念诵“太平经”。然后，人们由左向右环绕敖包3周，将硬币、酒等供品撒在敖包上。有的人还拣来石头，为敖包添石加岩，求得风调



希拉穆仁草原红格尔敖包祭祀活动

雨顺，人畜兴旺，草原太平。

祭奠完毕，人们则骑马乘车返回查干宝特格，举行“那达慕”盛会，进行传统的摔跤、赛马、射箭等比赛。一般全旗要从每个苏木挑选64名摔跤手和40名骑手参加角逐，奖励优胜者的奖品有马、牛、羊、绸缎和砖茶等。获胜者将奶食或糖块抛向观众，以示谢意。

除了大祭，周围的牧民群众和格少庙、巴彦花庙、百灵庙的喇嘛们还要分别进行小祭，以求神灵保佑。

达茂旗有5座由全旗民众祭祖的敖包，东有文公敖包，东南有额尔登敖包（位于召河），中间有巴音宝格达敖包、那日图敖包，西有满海敖包。除此之外，民间举行大型祭奠活动的敖包有红格尔敖包、查干敖包、巴音哈日敖包、英盖杏干敖包、塔日洪敖包、哈日敖包。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残疾人联合会干部）

石头的倾诉

——达茂草原岩画巡礼

邓宏伟

岩画，是古代人类描绘或凿刻在山岩上的图画。古代先民采用石制、金属工具（也有使用矿物颜料绘画的），将自身的原始宗教信仰、生产、生活场景描绘或凿刻在深色岩石上。岩画采用平面布局、二度空间构图，它以质朴的手法，刻画出先民自身居住、狩猎、畜牧、征战、人物、动物以及图腾崇拜等等与繁衍生息息相关的场景图形，以此来表达思想，感受生活，抒发情感，寄托心灵祈盼和精神

信仰，再现了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游牧先民活动的方方面面，是古代当地先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形象记录和生动写照。是一种以图形代替文字的文献宝库，故而被誉为“无言的史诗，不朽的艺术”。是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素材。史学界把岩画称为“历史的语言”，美术界认为岩画是“艺术之源”。

岩画究竟发端于何时？岩画学家经研究认为，生活在4万年前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创作岩画。关于岩画的发现，还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在19世纪末叶，有个西班牙贵族带着女儿，到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山洞中探寻古物，发现了许多原始

时代的石器和骨器。正准备离开时，贵族的女儿忽然指着洞壁喊道：“牝牛！”贵族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一匹野牛清晰、活灵活现地绘在石壁上，继续寻找又发现了数百只兽类的岩画，大小等身，有野牛、马、鹿、野猪等。都是用黑色似木炭的颜料勾出轮廓，内涂赭土或黄土。这个发现吸引了世界范围内考古学者的关注，判定岩画是数万年前的原始人制作的，并将其命名为“洞穴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时的先民，猎取野兽是其重要生产方式及生活来源，捕获动物，食其肉，衣其皮，闲居洞中，制作岩画，进而认为是“狩猎上的关于动物的迷信”。

内蒙古是中国古代岩画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在内蒙古西部的阴山山脉及山北草原、阿拉善沙漠的东缘，蕴藏着丰富的古代岩画资源。据初步统计，这里的岩画存量在3万幅以上。

辽阔的达茂草原，东西与四子王旗、乌拉特中旗毗连，北接蒙古，南靠阴山，富饶而美丽，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畜牧的天然牧场。考古调查研究表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有人类生存。之后，猗猗、柔然、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先后在这里驻牧，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明，岩画就是这一文明的真实写照及信息载体。在达茂草原深处，地表常常能见到一条条裸露岩脉的石岗，高出地表2—10米不等，大多呈东西向，也有南北向的，岗与岗相距在一百至数百米之间，像俯卧在草原上的石“龙”，蜿蜒而富有韵律。石

岗的岩石多系花岗岩，色泽灰白而古朴，是大自然风雨侵蚀的结果。这些岩石的表面，成为古代先民刻绘岩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画布”。调查发现，几乎每条石岗上都有岩画，少的几幅，多则数百幅。达茂岩画是著名岩画学家盖山林先生于1974年在敖伦苏木古城做考古发掘时率先发现并公诸于世的。20世纪80年代初，盖先生对这里的岩画做了较为系统的科学考察，并出版了《乌兰察布岩画》一书。其后，包头文物工作者继续工作，又相继发现了一批岩画。达茂草原的岩画蕴藏量达到了1万多幅，占全区岩画存量的1/3，是一笔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因此，达茂草原堪称世界古代岩画艺术宝库。

达茂草原岩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样，有人物、动物、居所、车辆、道路、什物、符号文字、天体等。野生动物岩画在达茂岩画中最，有野羊、野马、野驴、虎、狼、大角鹿、梅花鹿、驯鹿、马鹿、双峰驼、狍子、野牛、野猪、狐狸、披毛犀等20多种，还见有鹰、天鹅、鸵鸟等飞禽图案。作画者将这些内容把握得非常准确，而且形象生动。这些动物与古代先民的生活休戚相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于早期以狩猎经济为主的先民，尤为重要。

野羊的数量最多，包括岩羊、北山羊、盘羊、羚羊、黄羊。羊的类别区分集中在羊角上，岩羊的双角向头两侧弯曲；北山羊的双角并列向头后弯曲；盘羊的双角是向头后弯曲；羚羊双角的特征是短而向上斜曲；黄羊则无角。羊的刻画数

量与形态也不尽相同，有的单个表现，有的三五成群，还有数目多达十几只的羊群。形态上有的呈伫立状，有的低头吃草，有的正被猎人弓箭所射杀，有的列队而行，还有的小羊正依偎在母羊腹下吮奶，千姿百态，妙趣横生。

鹿是岩画中常见的题材，种类较多，刻画形象。作画者常常将鹿角刻意夸大，粗壮而枝杈繁多，造型各异，是其主要特征。鹿岩画单体存在的情况较多，与马、羊等其他动物混杂在一起的也不少，同时也有鹿群。众多鹿岩画的发现，说明阴山北面的古代达茂草原，水草丰茂，麋鹿成群，适宜鹿的生长繁育。包头，释作“有鹿的地方”，被称为鹿城，还是有其历史渊源和依据的。

马，具有迅捷、有耐力、温顺等特性，是草原游牧民族狩猎、畜牧、征战杀伐、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牧人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生物物种。基于人类对马的依赖性，岩画中马的数量仅次于羊。达茂旗查干敖包苏木金旗的马群岩画，刻在一块宽2米、高3米余的岩石立壁上。画面上可分辨的马有18匹之多，马头略上昂，两耳直立，鬃毛飘逸，散尾下垂，身躯肥硕，头向一致，呈站立态，线条圆润，造型准确，生动传神。远远望去，犹如一群膘肥体壮的骏马，悠闲漫步在茫茫草原上，那恢弘的场面和气势，十分壮观，令人震惊，表现了作画者高超的作画技巧。查干敖包苏木朝格其阿达嘎的马岩画是一匹单体马，刻在一块卧石平面上，呈站立姿势，尖耳上立，马鬃披散，躯体匀称，四肢粗壮，腹下还刻画出长长的雄性生殖



推喇嘛庙岩画位于达茂旗查干敖包苏木

器，将马表现得有力而雄健。

达茂岩画从表现的场景分类，还可以分为狩猎、畜牧、征战、居住、舞蹈及宗教信仰等10余类。狩猎是古代北方先民求生存获取生活来源的一项重要手段，并且代表着一个时代。即使进入文明时代，作为娱乐活动，也一直伴随着牧人的生活。因此，狩猎的图案在岩画中占有很大比重。达茂的狩猎岩画一般是单人猎，使用的武器是弓箭，射取野牲，也有射飞禽的图案。群猎和围猎的图案在达茂岩画中少见、反映畜牧场景的岩画，是达茂草原岩画的主要内容之一。畜养的牲畜有马、绵羊、牛、骆驼、狗、猪等，牧人常常处在畜群的边缘看护牲畜。莫若格其格山发现一幅牧羊图岩画，是放牧北山羊的场面。牧人肥腹，系尾饰，居羊群前面，身后的羊群随牧人前行，羊群中还夹着两只小羊羔。在牧人的前方，还刻画一只牧羊犬，似乎是表现牧后归家的场面，极富生活情趣。此外岩画中还有表现与畜牧相关的畜圈图。一幅幅畜牧岩画，描绘了草原旷远、静谧、悠然、祥和的氛围和浓郁的生活情调，是记录畜牧经济时代游牧先民

生活的生动、壮丽画卷。舞蹈岩画在达茂草原发现较多，有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3种。舞者一般头插羽毛，系尾饰，也有赤身裸体者。舞姿不一，有双手插腰、双臂上举、双臂端起、双臂下垂、半蹲姿等数种。双人舞一般是男女牵手连舞，女性的刻画是在上身的两侧表现出乳房。这些舞蹈形象，是游牧先民精神生活的生动写照，折射出古代北方草原快乐安适、歌舞升平的浓厚气息。

蹄印岩画种类多，数量大，是达茂草原岩画的一大特色。表现形式有单个存在，或二三个一组，也有的一幅岩画上刻有近百个蹄印。这些蹄印岩画大多是磨刻制作的，有马、鹿、羊等动物蹄印，其中马蹄印岩画最多。达茂旗推喇嘛庙发现的一幅“牵马图”，是岩画中的精品。牵马图，磨刻而成，画面主体是人牵马图案，人居马前，双手五指分开，系尾饰，引缰牵一匹高头骏马，作前行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蹄的表现手法，作画者突破画面的平面布局，将马蹄以蹄印的形式刻画在马腿下，表现出三维立体效果。同时整幅画面布局将人形刻制的较小，几乎与蹄印大小相当，重点刻画了蹄印。专门表现蹄印的岩画在查干敖包等地也有较多发现。

关于蹄印岩画，研究者一般认为应是缘于古代先民的蹄印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形式。人们祈盼家畜繁殖，丰衣足食，将一些相关的动物蹄印特别是马蹄印刻在岩壁上，顶礼膜拜。同时，畜牧时代的先民，还把蹄印视作牲畜、财富的象征。而马的蹄印，又被视为伟力的象征，神祇的化身，因而加以崇拜。后代将“元

宝”制成马蹄形，恐怕也来源于这种思想理念。

反映原始宗教信仰内容的岩画在达茂草原岩画中有很多，还有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太阳神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等。此外在岩画中发现与原始崇拜相关的巫师形象，表现为双臂曲举，五指分开，两腿分叉，足尖向外，足趾分瓣，腹下刻画女性生殖器，动作怪异。巫师被视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先民们通过巫师，来传达自身不能实现的愿望，表达祈盼以及作为精神寄托。巫师，随着原始宗教崇拜的出现而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

达茂岩画的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明清时代，时间跨跃四五千年。岩画中刻画的披毛犀、大角鹿等动物，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经灭绝，因此，岩画的刻制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查干敖包苏木塔克马拉发现的“人面像”，主体画面为猴脸形人面像，画面高57厘米，宽38厘米，磨刻制作，笔法稚拙粗犷，图案凝重、神秘，当是古代先民神灵崇拜的产物，其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时

期。岩画中车辆的描绘图案也不少，推喇嘛庙发现有“车辆·道路”岩画，画面中央是数条车辙印，表示道路。下方是两马拉一单辕、双轮、单舆车辆。这种车辆与商周时期的车辆形制大体一致，所以这类岩画制作年代应是青铜时代。同一画面上其他内容的表现方法及其特征，可以作为断代标尺，将这个时期的岩画从岩画群中区别开来。战国至秦汉时期，达茂草原是匈奴人的牧地，也是岩画制作的高峰时期，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特别丰富，许多岩画的刻画方法、构图，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纹饰图案一致，可以肯定这些岩画是匈奴人的遗存。继匈奴之后，鲜卑人占据达茂草原，也遗留下了相对比较丰富的岩画。唐代，这里是突厥人的牧场，创作的岩画题材有三花马、骑马人、山羊、岩羊以及符号等。有的岩画镌刻突厥字母，为岩画断代提供了依据。此时岩画制作风格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简要化、程式化、图案化、抽象化是其重要特征。后来，生活在草原上的契丹、女真、蒙古人也创作岩画，但与前期比较，数量已经很少了。

目前，在岩画断代与族属判定上，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三角形、圆形、十字形等符号岩画，以及一些难以解读的扑朔迷离的岩画图案等等，其寓意和内涵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仍需要做深入研究探讨，做出合情合理、客观、科学的诠释，逐步提高岩画学的研究水平。

（作者系达茂旗博物馆原馆长）



包头博物馆馆藏岩画

神勇英雄

哈布图哈撒儿

张贵



英勇愤怒的哈撒儿

清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授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儿的十七世孙僧格为茂明安部一等台吉，将其世袭地由呼伦贝尔草原迁至黄河之滨阴山台地和艾不盖河一带。茂明安部亦将其先祖哈撒儿的祭奠堂（蒙语宝日平欧日戈）随迁至黄河之北。后因蒙地放垦，先后4次将哈撒儿祭典堂迁至今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哈撒儿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叱咤风云，为蒙古帝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走进达茂，理应追怀英雄的哈撒儿。

哈撒儿亦称哈布图哈撒儿、拙赤合撒儿，史籍中多称合撒儿。他生于1164年，比铁木真（成吉思汗）小两岁。在哈布图哈撒儿祭奠堂内正中有一木制的佛龕，佛龕内供奉着哈撒儿的两幅画像，传说是用哈撒儿心脏的鲜血绘制的。其中一幅为“愤怒的哈撒儿”，不仅表现出哈撒儿刚毅的性格，亦反映出这位政治家和军事家最本质的气质。

哈撒儿的父亲也速该是孛儿只斤部

首领。哈撒儿7岁时，也速该在给铁木真相亲的途中误入仇敌塔塔部被毒死。铁木真被捕，在路途中逃跑，后联合克烈部等开始了部落间的争战。星移斗转，互相拼搏，在这野蛮的血亲复仇中哈撒儿只有仇恨和愤怒。他从小勇武善射，“身高三寻（古长度单位），顿餐三岁牛，披挂三重甲，驾三牝牛而来焉，……引弓放其叉披箭（箭名），射穿隔山一二十人。其斗敌之时也，引弓放其大披箭（箭名），射穿越野横渡人。大引而放其箭，则能射至九百寻，小弓放其箭，则能射至五百寻”（《蒙古秘史》卷7）。这里的描述虽有夸张，但他确实是一位力大无比和射艺高超的英雄。当蔑儿乞惕部来到斡难河（黑龙江上源）追杀铁木真时，哈撒儿独弯弓以待，敌不敢逼近，铁木真方得乘机脱身。1189年，蒙古部落推铁木真为汗，命哈撒儿为兀勒都赤领宿卫。

正当铁木真部势力日渐强大时，原为盟友的王罕反目成仇。1203年，在哈兰真沙陀（今东乌珠穆沁旗）成吉思汗被王罕打败，哈撒儿的妻子亦被俘，哈撒儿携幼子脱忽逃跑后与成吉思汗相会。次年，哈撒儿令亲信假降王罕，王罕信以为真，遣

部将亦秃儿干盛血放牛角饮而为盟。当亦秃儿干来到克鲁伦河畔与哈撒儿相会时，伏兵四起，亦秃儿干被俘伏诛，哈撒儿进而袭击王罕部取胜。

1204年，铁木真出征乃蛮部，令哈撒儿为中军。成吉思汗摆下“摆如海子样阵”，即协调作战，仿佛波浪起伏，次第而进。然后成吉思汗令哈撒儿冲敌之中枢。哈撒儿如铁锥之凿木，率兵由散而聚，直锥敌顶心。乃蛮部首领太阳罕闻风而逃，哈撒儿追至纳忽山（鄂尔浑河东）。乃蛮部由于夜深看不清路，军士多滚落堑底，太阳罕被擒。战后成吉思汗称：“纳忽山一战，擒之论功，以哈撒儿为第一，予以恩赏，凡哈撒儿子孙位次在宗室之上”（《新元史·哈撒儿传》卷105）。

1206年，铁木真被推为全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委哈撒儿以四千户。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伐金，兵分3路，哈撒儿为左路。取下中都（北京）后，哈撒儿为受降的将领，占据今河北、辽宁一带。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委任哈撒儿留守漠北本部，驻牧在自己封地呼伦贝尔草原，建造了额尔古纳黑山头古城，从此结束了一生的战斗生涯。



哈布图哈撒儿祭奠堂

宽容慈祥的哈撒儿

哈撒儿祭奠堂内正中佛龕中另一幅哈撒儿绘画是“慈祥的哈撒儿”，显示出他“非慈厚无以怀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

《蒙古秘史》中形容哈撒儿“身躯莽如大魔君”，当发怒时吃下全身的大汉都不会挨着他的喉咙，但他对知己者却十分宽容。成吉思汗成为大汗后，巫师阔阔出心怀鬼胎，挑拨成吉思汗与哈撒儿的关系。他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有旨，要不铁木真为国君，要不哈撒儿为国君，若不早除哈撒儿，则事未可知也！”成吉思汗听后立即乘骑去擒哈撒儿。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得知后立即连夜乘白驼帐舆（车）追赶，日出时至。成吉思汗正缚哈撒儿，口其冠带而审问，此时的哈撒儿并未发怒却如羔羊。诃额仑下车后马上给哈撒儿松绑，怒不可遏，盘腿而坐，敞开她的衣襟露出双乳说：“见之否？汝等所哺之乳在此！你们四个兄弟都吃过我的奶，但只有哈撒儿吃过我的两个奶。”成吉思汗羞愧难当，忙说：“受母之怒（责），

惧则惧矣！羞则羞矣！吾其退乎？”（《蒙古秘史》卷10）但事后成吉思汗还是背着母亲将哈撒儿的四千户降为一千四百户。诃额仑得知后内心忧闷，不久去世。然而哈撒儿却不计恩怨，宽大为怀，仍全力效忠成吉思汗。1211年，他领东路军出征金国，直取蓟（治所今天津蓟县）、平（治所今辽宁辽阳）、滦（治所今河北滦县）等州。

1220年，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从山东莱州出发西行，“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长春真人西游记》）。此时哈撒儿得到丘处机西行的消息，为表示自己向善求道的诚意，便委派专使特邀丘处机到自己封地，专使在今河北宣化与丘处机相会。1221年2月10日，丘处机在使者护卫下辗转东北行，经野狐岭（张家口）、抚州（张北）、盖里泊（宝昌）、鱼儿泺（克什克腾旗）。4月1日，丘处机来到哈撒儿的行帐。西沙河（海拉尔河）清澈见底，两岸满是红柳，黑车白帐成列。哈撒儿再不是愤怒的面孔，向丘处机献上马奶。他本想讨教道术，又一想不妥，便说：“上遣使万里，请师问道，我曷敢矣！”丘处机与哈撒儿



相处17天。临别，哈撒儿特在阔连海子（呼伦湖）为丘处机送行。

白帐圣堂的赞歌

现今内蒙古的科尔沁各旗、乌拉特三旗、四子王旗、茂明安旗的蒙古族大都是哈撒儿的后裔。而白帐圣堂一直由茂明安部祭奉。原哈撒儿祭奠堂有5个白色蒙古包，是用无杂色毛和无印记的白毡做成。康熙三年（1664年）圣堂随茂明安部迁入今达茂地域。今日哈撒儿祭奠堂坐落在一座银光闪闪的山丘之中，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十分壮观。

哈撒儿祭奠堂的白帐围毡每3年换一次，旧的围毡仍存放在祭奠堂外。祭奠堂正中佛龕挂着哈撒儿的两幅画像，佛龕左侧放着哈撒儿的弓箭和箭囊，右侧放着蒙文《圣主成吉思汗的祭奠经》《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谱》，像前供放供品和佛灯。平时每天由主持祭典仪式的呼呼格烧香供奉。每年举行5种不同规模的祭奠仪式，每次都要在4口大铁锅内煮“秀斯”（全羊），祭奠时将全羊腿、下颌、口条、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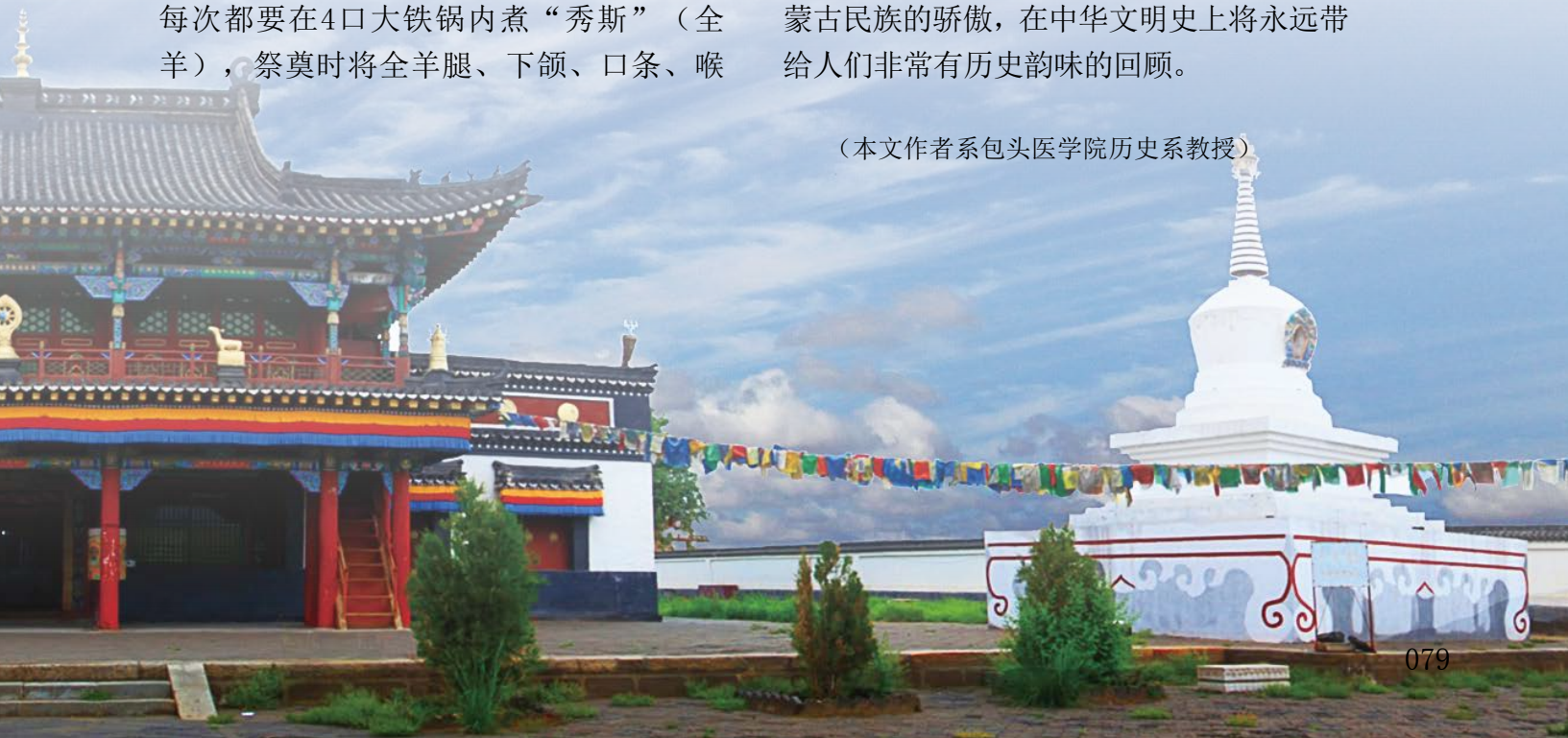
咙和五脏供在哈撒儿的弓箭处，将全羊的肢、背等放于4个木盘供在哈撒儿的像前，称“四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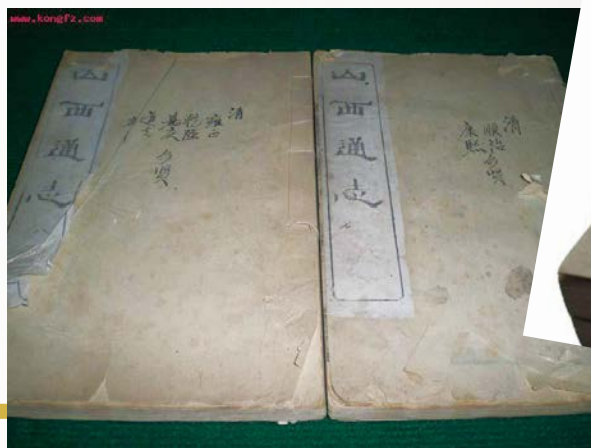
祭奠哈撒儿时，主持人呼呼格诵着赞歌，不仅是对哈撒儿一生业绩的歌颂，亦祈祷祖先给他们带来吉祥。

英勇的圣主，
请您把众民，
拥在宽襟下。
言在宽宏之中，
闻在您的万聪中，
看在您的千目里。
前程无量，
所向披靡
安居乐业吧！

哈撒儿的灵柩安置在成吉思汗陵内的“八白室”。哈撒儿祭奠堂毁于“文革”。1988年，达茂旗重新建造哈布图哈撒儿祭奠堂。旧物无存，只有一口煮“秀斯”的大铁锅让人想起已故的主人。哈撒儿祭奠堂是蒙古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文明史上将永远带给人们非常有历史韵味的回顾。

（本文作者系包头医学院历史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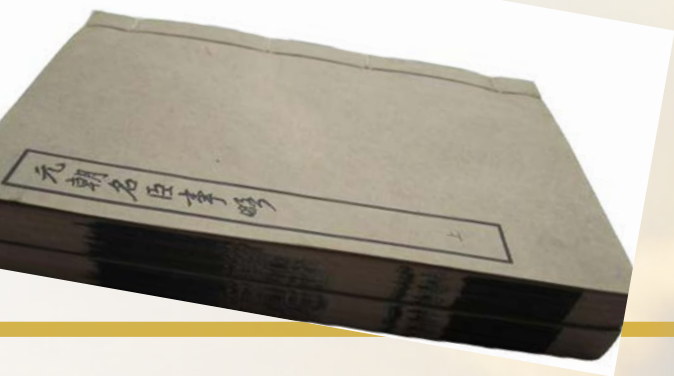
阿剌海别吉与汪古部

孟克德力格尔

蒙元时期，汪古部监国公主即成吉思汗的三女儿阿剌海别吉。《蒙古秘史》卷 10 记载：“将阿剌和别乞名字的女子与了汪古惕”。最早出现有“监国公主”记载的是《繁峙王氏世德碑》。碑文称：“丁丑，大兵围雁门，游骑及县境，金人弃城奔溃，城中遗民共推公（即王兆）与县人刘会通领县事。谋走南山栅险自保，公度不可乃与会等十数人持牛酒日经至主帅下，通史名款，且献攻取之策。主帅伟公言貌，以便宜摧授左监军……续受监国公主教迁昭武将军，坚州左副元帅。”是年为1217年。王兆、刘会等归顺天大兵主帅，授王兆为左监军职，最后还得有监国公主正式除授升迁。这支围雁门的大兵，可能就是领白勒朝国事的阿剌海别吉的汪古部的军队。

与王兆同领县市的“县人刘会”也有碑文传世，碑文说：“……懿旨超加骑将军，坚州都元帅兼节度使，悬带虎符金牌，便宜行事。……子男二人……长曰泽……泽娶铁氏女一人，弱冠质于公主位下积有年，铁氏偶疾而终，以子泽服劳之故，深蒙见知，鼓旨赐以室女陈氏……公（刘会）是时春秋已高，累，退，特蒙帮旨拟令子泽承袭，充坚州管民长官。”碑文中只称公主，这位公主不会是别人，就是监国公主。

在官修的《元史》中，也有关于监国公主的记载。《木华黎传》载：“（辛巳）秋八月，从驻青，监国公主遣使来劳，大飨将士。”《元朝名臣事略》也有同样的记载：“王（木华黎）至天德，监国公主遣其臣习里思劳王，且飨将



士。”“天德”就是丰州，故城在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附近。从这段记载来看，土默川平原也属于汪古部管辖之地。

监国公主就是阿剌海别吉，在《山西通志·仕实录》中的《李恂传》里说得更清楚，“李恂，汾州西河人，金末寇乱，恂集乡保人御，己卯（1219年），太祖之妹曰刺海，号监国公主，遣行省不华收河东，公主承制，授检汾州左监军”。这段记载没讳其名，说监国公主名叫刺海。

“太祖之妹”之说，显然有误，应为太祖之女。此误系民间传说，不足为奇。

阿剌海别吉何时称为监国公主，不见于史籍。最早的史料见于上面提到的《繁峙王氏世德碑》中的记载，在《刘会碑》

《李恂传》以及《元史》等文献中都有监国公主的称谓。丁丑系1217年，是成吉思汗西征的前两年。也就是说，成吉思汗西征前，阿剌海别吉就已经称监国公主了。1221年赵洪的记述也是可信的，阿剌海别吉“今领白鞑靼国事……凡征伐斩杀，皆自己出”。直到1236年秋7月，窝阔台“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温沐，中原诸州民户

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的诏书中，“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剌海……于东平府内拔赐”。可见直到这个时刻，阿剌海别吉依然是汪古部的代表人物。监国之称，早已有之。君主不在，太子留守掌政，谓之监国。自成吉思汗始，据载监国者有：成吉思汗西征时，斡赤斤留守本土，谓监国；成吉思汗死后，皇子拖雷监国；及至元朝将亡，顺帝北奔，还“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留守京师。而阿剌海别吉监国公主，并不是领蒙古本部事宜。洪钧认为阿剌海别吉“夫死，自领汪古部事”，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说阿剌海别吉为漠南监国，是很勉强的。

阿剌海别吉领汪古部事时，确实显示出她的非凡才能。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线索。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说：“公主明惠有智略，祖宗征伐四出。尝摄留务，军国大政，率谘禀而后行，帅出无后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

《蒙鞑备录》记述：“所谓白鞑靼者……今部族之后，其国乃鞑主成吉思汗公主必姬权管国事。”又载：“今领鞑靼国事，



蒙古公主画像

日逐看经，有妇士数千人事之，凡征伐斩杀，皆自己出。”这段记载，正是上面所说的明惠、智略最好的注释，所以人们称阿刺海别吉为监国公主。

虽然阿刺海别吉只领汪古部政事，但是当时蒙古王、驸马等都有权任命地方官吏，根据史书上的片断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权限是很大的。她不仅掌管汪古部事，还要以降“懿旨”任命今山西、河北等地的官员。如命王世德为“昭武将军，坚州左副元帅”，“刘会为骁骑将军，坚州都元帅兼节度使”，令刘会之子承袭父职，“充坚州管民长官”，命李佺为汾州左监军。1228年，拖雷监国时，阿刺海别吉仍任命王娜行省事于中都。据《元史·

王械传》：“子，奉监国公主命，领省中都。”可见阿刺海别吉的权限已远及今河北地区。从以上分析，我认为铜印印文的“河北”，其范围就是现在的整个华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的地方。因此，监国公主所管的范围已超出了汪古部本部，与后来蒙哥时期任命忽必烈为“总理漠南汉地民事”大体相当。

《蒙古秘史》卷10仅仅说将阿刺海别吉嫁给汪古部了，到底嫁给谁为妻，没有说明。关于这个问题，有关史料记载较为混乱，研究者的意见也很不一致。汪古部首领阿刺兀思·惕吉·忽里在协助铁木真征服乃蛮部，统一蒙古各部中功勋卓绝，铁木真为了酬谢阿刺兀思·惕吉·忽里对他的支持，一方面仍令他管原汪古部领地及其臣民，另一方面乃与他约为婚姻。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大奉贵族、功臣及各部首领。据《蒙古秘史》卷8记载，称阿刺兀思·惕吉·忽里为古列坚。古列坚，意为女婿。由此看来，阿刺海别吉曾嫁给阿刺兀思·惕吉·忽里是没有疑问的。从史料看阿刺兀思死于泰和七年（1207）。而他协助征讨乃蛮部是在1204年。阿刺海别吉是在此事后嫁给他的，因此，他们俩人结婚的时间不长。

有的史料说，阿刺海别吉嫁给了不颜昔班。《蒙鞑备录》说，“二公主曰阿里海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国亡臣百四部，死，寡居”。《黑鞑事略》也有同样的记载，“白厮马，一名白厮卜，即白鞑伪太子忒没真婿，伪公主阿刺海之前夫”。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中认为白四部、白厮卜都是不颜昔班之异文的见解是

正确的。不颜昔班是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之长子。官修的《元史》则只记载阿剌海别吉嫁给了孛要合。《公主表》称，“赵国大长公主阿剌海别吉，太祖女，适武毅王一要合”。此说本于《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所以之言嫁孛要和。

波斯史料则认为是曾嫁给镇国。镇国曾娶阿剌海别吉也可以从镇国袭封北平王得到旁证。《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中载，“镇国至，封北平王，握金印”。《元史》也称：阿剌兀思子“孛要合尚幼，先封其侄镇国为北平王”。由此我们得知，镇国曾掌汪古部政事。镇国子聂古解亦封北平王，并纳睿宗皇帝之女独木干为妻。但是碑中将镇国和阿剌海别吉的关系隐去了。从这些片段的记载中，我们亦可看到阿剌海别吉确实嫁给过镇国的一些线索。

显而易见，各种史料的记载相互抵牾，而且出入颇大，所以出现不同的记载。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分析：第一，这些史料各自撰写的时间不同，所以它只反映了当时一时的情况。如《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是出使蒙古地区的宋朝使臣记述的。他们在蒙古地区逗留的时间较

短，未能究其详史，只是叙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所以出现了阿剌海别吉“曾嫁金国亡臣白四部，死，寡居”等语。而当时的不颜昔班和镇国确实已死，而孛要合又随成吉思汗远在西域未还，因此这样的记载虽然不尽翔实，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蒙古秘史》称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为驸马的记述也是真实的。第二，有意避实，掩其真相。最典型的要算阎复撰写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了，碑文中只言阿剌海别吉嫁孛要合。该碑成于大德九年（1305年），撰写人虽然详知阿剌海别吉一嫁再嫁，但却不顾历史的真实，在阿剌海别吉的名字上做了些文章，称“祖驸马孛要合”的妻子，“祖妣皇曾祖姑”是阿剌海别吉，称“曾祖阿剌兀思的王妃，曾祖她是阿里黑”。实际上阿里黑和阿剌海别吉实为一人，其目的显然是有意避讳阿剌海别吉多次改嫁这一历史事实。古代北方民族流行父死自妻其后母，兄死弟妻其嫂的习俗，匈奴民族就是以此为俗，史籍有明确的记载。古代蒙古民族亦流行此俗。阎复撰碑文之所以曲意避实与当时的风俗习惯变化有关。有关汪古部的历史文物发现还不多，而监国公主的文物，还是首次发现。这方铜印应是阿剌海别吉的官印，她不仅仅领汪古部政事，在某种意义上，她还可以管辖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铜印的发现地及其附近的城址、墓葬，都应是有关汪古部的遗存。这些为我们探索早期蒙古和汪古部的历史及当时的民族友好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人大原主任，蒙古史专家，内蒙古哈布图哈撒尔祭祀代表性传承人）



电视剧《成吉思汗》剧照

额仁庆达来起义

陈全增



额仁庆达来

额仁庆达来原名巩德玛，是召河人。她很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学习乘马、射击，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巩德玛相貌出众，聪明过人，在她15岁时，做了茂明安旗扎萨克齐木德仁庆豪日劳的哈屯（夫人），改名额仁庆达来。

日本侵略者侵入达茂草原后，成立了伪政权，对各蒙古旗进行统治。茂明安扎萨克齐木德仁庆豪日劳（简称齐王）是个

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他从不去结交日本人，还暗中同抗日的国民党部队联系，于是就成为日伪政府的眼中钉。1942年农历4月，齐王被驻扎在百灵庙的日寇特务机关诱捕，之后不久就被残忍地杀害了。

额仁庆达来面对飞来的横祸，欲哭无泪，杀夫仇、民族恨变成了熊熊烈火在她胸中燃烧。她暗暗下定决心：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额仁庆达来安葬了齐王以后，仔细回忆齐王被捕和遇害的过程，经过认真分析，认定额尔登朝克图梅林就是茂明安旗内部出卖齐王的奸细。额仁庆达来的分析是对的，额尔登朝克图梅林早就被日本人收买成了蒙奸，就是他出卖了齐王。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以后，额仁庆达来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联系了几位在旗保安队任职的原齐王的心腹，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划后，开始了起义行动。

1943年正月二十九日，额仁庆达来突然率领茂明安旗保安队官兵70多人，包围了额尔登朝克图梅林的住宅。她先派亲信，以给梅林拜年为名前往额尔登朝克图梅林家打探虚实，然后派3名旗保安队士兵在假装为梅林献鼻烟时，将梅林捕获。额仁庆达来在历数了额尔登朝克图出卖民

族、投靠日寇、勾结日寇、谋杀齐王的一系列罪行后，命令士兵将其押赴南山就地正法。

镇压了罪大恶极的蒙奸额尔登朝克图之后，额仁庆达来向跟随她的70多名官兵宣布：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扎萨克齐王，日本人是我们的死敌，是我们的仇人。现在我要率领大家去陕坝，投奔傅作义将军，与傅将军合作抗日，为被日本人害死的茂明安人报仇，为齐王报仇！随后，这支起义队伍在额仁庆达来的带领下行进，直奔陕坝。

额仁庆达来率部起义的行动很快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当起义队伍行进到乌拉特中旗的四大沟村时，被乘坐汽车追来的日本特务包围，起义队伍的所有枪械被收缴。日本特务机关长阿司卡以为起义队伍被他们震住了，就命令额仁庆达来带领全体人员立即返旗，说杀死额尔登朝克图梅林的事可以不追究。说完，阿司卡就带领特务乘汽车返回百灵庙。

日本特务一走，额仁庆达来从靴腰子中又掏出一把手枪，高声喊道：“日本人心狠手辣，我们回去必遭毒手。既然我们已经起义，开弓没有回头箭，谁也不准回去，跟我继续向西走！”额仁庆达来决心奋起抗战的立场，使参加起义的官兵备受鼓舞，都打消了顾虑。就这样，这支队伍在

额仁庆达来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奔向陕坝。当日本特务机关得知起义队伍没有返旗而是继续向西前进，为时已晚。此时，起义队伍已经进入了傅作义部队的控制区。

起义队伍受到了当时驻五原三军军长孙兰峰将军的热烈欢迎。几天后傅作义将军在陕坝亲自接见了额仁庆达来，对她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毅然决然武装起义的壮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她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大无畏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额仁庆达来起义后，1943年春，被委任为茂明安扎萨克兼保安队司令，并被授予国民党军陆军少校军衔。之后几年中，额仁庆达来和她的起义队伍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绥远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她一直跟随傅作义部队，直到1949年9月绥远省和平解放。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文广播局干部）

舍己救人的武装部长——

孟克达赖

黄海霞

孟克达赖，1930年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一个蒙古族牧民家中。他从小就给牧主家放牧，没有机会上学读书。1946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蒙古骑兵师三十四团服役，曾参加过解放战争。

1954年，他奉命转业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联合旗工作。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曾先后7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59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4年，孟克达赖调至达茂联合旗百灵庙镇武装部，任部长一职。在任期间，他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受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肯定与赞扬。建国十五周年国庆，孟克达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赴北京观礼，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74年5月1日，孟克达赖率领民兵进行打靶和实弹投掷训练。在训练中，首次参加实弹投掷的小徐，因过度紧张而一甩

手就把手榴弹扔到了自己身后4.9米处，手榴弹哧哧冒着白烟，在场的30多名民兵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危急关头，孟克达赖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扑向了冒白烟的手榴弹。在场的民兵得救了，而年仅44岁的孟克达赖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孟克达赖，草原蒙古族人民的好儿子，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人生最壮丽的篇章。草原各族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英雄的儿子而痛惜，也为拥有这样一位英雄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1974年5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决定，给舍己救人的英雄孟克达赖追记一等功，追认为烈士。从此，孟克达赖这个英雄的名字从内蒙古大草原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其英雄事迹也被编进了蒙授语文教材，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本文作者系达茂旗委宣传部干事）

纪念百灵庙武装暴动 50周年

布 赫

塞外一声惊雷，
官兵同举义旗。
唤醒民众千万，
横刀跃马杀敌。
青山红旗风展，
日伪胆战心萎，
伟绩史册永载，
英名万世长垂。

（1987年2月10日）

（1986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为纪念百灵庙暴动50周年题词）

〔注〕：百灵庙武装抗日暴动发生于1936年2月，题目由编者加。

达茂旗牧区抗旱图

布 赫

百日天雨，千里不绿。
牛羸马瘦，人人焦虑。
牧民有志，罹灾不惧。
贮草运料，马不离舆。
抗灾保畜，不辞劳劬。

（1987年9月2日）

（布赫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这两首诗选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布赫诗集》。）

重游百灵庙

肖 克

茫茫大草原，
百灵负盛名。
今日庙犹在，
山川已一新。

（1985年）

（作者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赴达茂有感

杨植霖

其〔一〕
故土萦思念故人，
兄弟相见倍感荣。
心花激起狂欢泪，
远道来迎愧心中。

其〔二〕
远看仙子落人间，
歌声绕彻草原天。
天湖岸上寒暖意，
语悦情深胜酒甜。

（这两首诗是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杨植霖考察达茂旗时所作。题目由编者加。）

草原千里白云天

邓拓

草原千里白云天，
漫野风光大漠边。
蒙汉一家情意重，
百灵庙畔好留恋。

(1964年新华社副社长邓拓视察百灵庙题诗)

[注]：题目由编者加。

敖伦苏木古城

康丕耀

日尽残墙八九花，
霜凝古树两三鸦。
千秋黑河波依旧，
城上西风吹落霞。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包头诗词》责任编辑)

希拉穆仁草原

胡云晖

汗漫寻幽五月初，锡拉河畔宿穹庐。
水流绕寺灵光见，山远如痕浅墨涂。
天是纯蓝云澹荡，野无杂色绿模糊。
清游得此闲心境，胜读多年访道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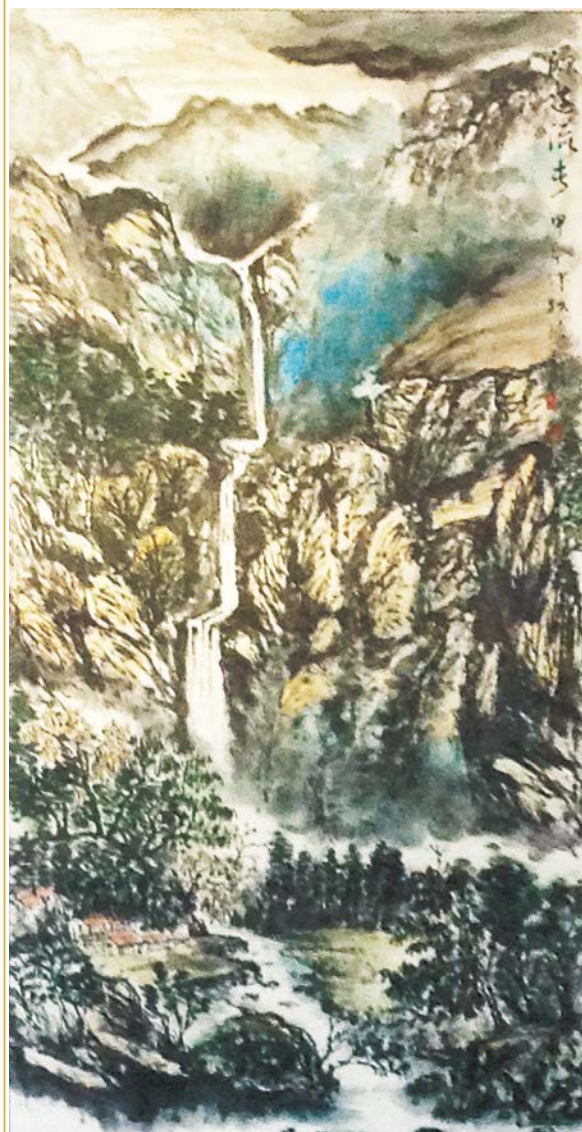
(作者系包头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



高琦，自幼酷爱艺术，现为《经济日报》华夏书画院院士、颜真卿书画院名誉院长、颜真卿研究会会员，包头市青年书画协会达茂旗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康振邦，1962年生于达茂旗。内蒙古书画研究会会员，包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包头市政协书画院院士。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区内外书画展赛。山水画《山中隐岁华》入选包头市第二届书画大赛，作品集。





刘 海，
1961年出生于包头市达茂旗。现为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会员，包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秦 瑞，内蒙古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会员，达茂旗老年书画艺术协会主席。作品多次参加自治区、盟、市、旗县展出并多次获奖。

